

【编者的话】

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近日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

这本由政府资助编制的国民教育教材，因其内容倾向性明显，回避了对中国模式的负面评价，被不少港人批评为“洗脑教材”。而这本教材的出现，更加剧了香港民众对即将于中小



学推行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担忧——香港的下一代是否会因为这样的教育，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香港是否需要这样的“国民教育”？

本期 1510 周刊以香港国民教育之争为出发点，通过比较借鉴各地的教育模式，探究何为理想的“国民教育”。

香港“国民教育之争”持续数月，正反双方相持不下。支持派强调，国民教育本是国际惯例，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国情的了解不足，亟需教育弥补。张锐辉的文章，指出狭义“国民教育”和国际上普遍推行的“公民教育”之不同，并从课程设置理念及内容安排着眼，分析其存在保守化、缺乏人文精神关怀和培养犬儒主义者的问题。陈婉莹质疑教育主事者思路不清，将国民教育的内容简单化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推行国民教育的同时，轻视历史教育，因而无法得到社会认同。

那么，其他国家又是如何进行“国民教育”的呢？在西方国家，国民教育往往是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进行的，而后者才是西方教育关注的重点。在龚群和刘常庆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和德国的公民教育虽存在侧重点上的不同——前者更注重与道德教育结合，后者鼓励通过开放性的辩论强化公民意识，却也有共通之处，即都强调社会参与。

最后，让我们反观中国的国民教育。徐贲认为当今的中国存在品格教育，却缺乏公民教育，这使中国国民缺乏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精神。但中国的公民教育也并非一片荒漠，傅国涌的文章梳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公民教育教材，展现几代有志之士，为发展公民教育付出的巨大努力。可惜，这样一项事业在 1949 年后销声匿迹，至今未能恢复。在郭忠华眼中，正是这“未竟的事业”，使国民精神建设与物质文明发展背道而驰，成为现今种种社会危机的根源。

今天的公民教育又该何去何从？龙应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将从前所标榜的道德培养和爱国教育，转化为对全球社区的关怀和行动，培养全球公民意识，从而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观】

8-1 陈婉莹：国民教育之争是“一罐机缘”



“《中国模式》手册不过是把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乱不清：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却在新高中课程中将中史降格为选修课程。让香港新的一代，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香港大学博物馆总监曾对我说，到博物馆参观的中学生，有的连’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常识都不懂。”

如果说香港国民教育之争打开了一罐虫子（a can of worms），它也打开了一罐机缘（a can of opportunities）。让香港人审视自己被误导的价值观，也推动港人积极提出自己的“中国论述”，而不是被动的“取消派”。

国情教育课程引起家长群情汹涌，反映了香港中小学教育的深层问题，也带来了全民参与、改革教育的契机。国民教育之争牵动了香港人的神经，特区政府不可能与天下的父母为敌。政府笨拙施政，没有道德权威，也讲不出能取信大众的道理，硬推的话，可能引致比二十三条更大的管治危机。

但另一方面，反对国民教育运动目前的挑战不是能动员多少人上街，或争取多少签名，而是如何超越反对和批判，提出面对现实与将来的“中国论述”。

国情教育风波的导火线是《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教材》，这小册子由香港教育局出钱，但编得太烂，内容偏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也不敢为之护航。特首梁振英退而用《德



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为挡箭牌，只是该指引同样问题百出。对所谓国民教育的内容简单化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脱离香港的现实，得到社会认同注定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国民教育教学大纲》的基本理念是“国民教育以情为本”，鼓吹“国情、真情、情怀、情感”，所包含的概念层次太低，鼓吹对国家的“情怀”，就比大陆的开明人士落后太多。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夏中义在中国推动“大学人文课程”，带领团队编了一套三册读本：《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二零零二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人与国家》卷首语写到教材的宗旨是要让学生反思“你将如何面对故土百年沧桑，及其社会文化转型，以期将自己塑造成迥异于卑微子民的‘现代国民’”。

什么叫合格的“国民”？《人与国家》的九章目录勾画了国民认知要求的脉络：“让记忆唤醒历史”、“传统与变革”、“重新点燃启蒙火炬”、“革命反思录”、“自由思想档案”、“民主ABC”、“平等与公正”、“个人、社会、国家”、“什么是知识分子”。在这些命题下，编者选进的中外作者有鲁迅、陈独秀、胡适、李锐，也有得到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亚马提亚·森等人，合共约一百篇文章。香港的中学何不利用现成的材料，编个简本给中学生？

《人与国家》的编者在导言中这样解释国民的精义：“及格的公民应该能够走出专制主义造就的‘顺民’与‘暴民’的传统笼罩，清楚地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意识到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如果这是香港“国情教育”的宗旨，相信家长和公众都不会反对。与之比较，香港的教材指引空泛肤浅偏颇，令人汗颜。

媒体越挖越深，发现香港推行国民教育早在十年前启动，并非今年才开始。

《中国模式》手册不过是把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乱不清：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却在新高中课程中将中史降格为选修课程，让香港新的一代，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香港大学博物馆总监曾对我说，到博物馆参观的中学生，有的连“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常识都不懂。

其次，风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暴露了香港教育的不平等：厘定教育政策的政府高官早就对教育制度投了不信任票，把子女在中学的时候就送到海外，或者选择国际学校。有办

法的上英基学校，普罗大众的子女才进地道的本地学校，要上国情教育课，这更使平民家长气愤难平。

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多元声音、各种政治倾向的学校共存。办学团体有权选择教材，家长也有机会选择学校。不同理念的团体，可以出版不同的教材，让学校和家长选择。

《中国模式》教材的问题出在其得到了政府资助，教育局有没有资助其他国情教育教材的出版？还是只此一家？教育局是经过什么的程序招标、评核？又如何挑选"当代中国研究所"设计教材？教材写好后又经过什么程序"收货"？国民教育的经费是多少？如何分配？社会大众有权要求教育局公开有关材料，保证公款使用公平、透明。

另一方面，公众反对港府版的国情教育教材，特别是大众媒体，也要避免轻易标签化他人的想法或其他教材"红色"。

我也反对双重标准，譬如陈日君主教也发声指责国民教育洗脑，讽刺的是天主教学校就是在主持大规模的洗脑工程，教授创造论，宣扬天主造人和天地万物，和进化论唱对台戏。美国就规定公款支持的学校不得组织集体的宗教活动，但不限制个人信教自由。反观香港，罕见社会质疑教会教育内容。

学生和家长组织起来参与校政，是改革教育制度的契机。参与中国改革是香港的宿命，香港和中国大陆是命运的共同体，寄望港人能超越对港版国民教育的反抗，进而建立对中国课程的共识。

（陈婉莹，香港大学新闻教授、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总监，曾在美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一九九八年来专注高等教育，推动信息开放和教育发展。本文原载于《亚洲周刊》2012 年 8 月 19 日刊。原文链接：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2283519512/33af1.cfm）

【返回首页】



8-2 张锐辉：倒退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



“整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分为五个范畴，分别为个人、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每个范畴均定下了一系列要培育学生发展的价值观和态度。然而，民主、自 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是归纳在世界公民的范畴之下；相反，国家公民范畴下的价值观与态度，竟是欣赏、理性、团结、包容、爱国心等等，都是一些不包括普世价 值内容，却是服从性的、妥协性的态度，不禁令人恍然大悟：原来‘国民教育’就是不以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去思考国家问题！”

去年十月，特首施政报告首次指出要设立独立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并预计要在 2013 学年推行。当时社会上已就应否改变现时渗透式校本自决的公民教育模式、对国民教育内容及推行手法的忧虑等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然而，制订“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的专责小组，稍后仍悄悄成立。以往，一个教学课程，由草拟编撰至推出予公众咨询，通常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并且有两至三轮的咨询。然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由小一至中六级的课程，竟在半年之内完成洋洋近三百页的课程咨询稿，更没有表明有多少轮咨询，不禁令人万分质疑：如此急就章完成的课程，究竟能否回应之前的社会争议？又能否充份检视现时的公民教育发展，作出与现存各个课程相互配合的安排？甚或是否尊重现行的多轮咨询机制? 现先集中“国民教育”部份评论。

首先，课程名称放弃了以往一直沿用的“公民教育”或是“公民科”，已反映出对于课程在实践公民教育的倒退。事实上，就是在课程文件中，也明确指出现今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国内）正在推行的都是更广义的“公民教育”，而非狭隘的“国民教育”（咨询稿 页 13）。但是，整份文件却没有解释“舍公民教育”“扬国民教育”的原因，只是在委员作口头解说时，不断强



调广义的公民教育内容，如培养学生建立如人权民主等的普世价值，仍是课程的目标。并且一再强调老师不用回避如六四等的敏感问题，似乎要告诉大家只是文字游戏，实质上没有分别。

然而，当细阅课程内容时，却发觉这个说法刻意淡化了"国民教育"的保守特质。整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分为五个范畴，分别为个人、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每个范畴均定下了一系列要培育学生发展的价值观和态度。然而，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是归纳在世界公民的范畴之下；相反，国家公民范畴下的价值观与态度，竟是欣赏、理性、团结、包容、爱国心等等，都是一些不包括普世价值内容，却是服从性的、妥协性的态度，不禁令人恍然大悟：原来"国民教育"就是不以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去思考国家问题！

其实，早在 1998 年，中一至中三级亦已经编订了"公民教育科"的课程，"国家民族社会"当然是内容之一，整个课程内容，是由家庭至国际社会由近至远去学习及认识不同的公民身份与责任。

而 2009 年实行的高中通识教育科包括了现代中国的单元，整个科目的性质是包容而开放的：

> *通识教育科采用**议题探究**的学与教方法，鼓励学生独立学习以追求知识，并**对新的事物持开放的态度**。透过探究与本课程主题相关的议题，学生可以学习找出不同主题和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及**了解知识的复杂内涵和组织**。…*
>
> *(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评局 (2007)《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页三》*

可是当我们再看现存于教育局课程发展范畴内的"国民教育"，其定义却是相当的狭隘：

> *自回归祖国以来，提高学生对国家的认识及国民身份认同，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既定政策和首要任务。教育局一直致力鼓励学校从"加深对国家认识"、"培育对国家情怀"及"实践对国家承担"三个层面入手，为学生提供整全的国民教育学习经历；…*



(摘自：教育局网页：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 – 国民教育)

再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如何将上述定义化为学生学习的目标时，只看到低层次的认知与认同，却缺乏了批判与普世价值的建立：

> *以孕育家国情怀为中心，乐于了解国情，包括：自然国情、人文国情、当代国情和历史国情。通过有系统的国情学习，引领学生探讨国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作出情理兼备的判断。藉此让学生培养国民素质，提升国民身份的认同，并继往开来，既能传承中华文化，亦能对于国家发展有所承担，愿意为国家及民众谋福祉，加强和谐团结、关爱国家民族的情怀，成为了解国情、关爱社群、乐于承担、敢于创新的国民。*

(摘自：咨询文件, 页 18, 国家范畴的学习目标)

反而是在世界范畴的学习目标才提及了批判思考各普世价值，但却还要"兼顾国情"。课程对学生的思维发展，可说是步步为营：

> *世界范畴的学习，旨在引导学生认同自己亦是世界的一份子，能从世界角度思考问题，尊重多元文化，关注全球共通议题，进而积极履行世界公民的义务，缔造和平、公义、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学生亦会建立批判性思考，在面对具争议性的普世议题时，能持世界公民的视角，同时亦兼顾国家国情，以理解问题，并作出情理兼重及务实的判断。*

(摘自：咨询文件, 页 20, 世界范畴的学习目标)

此外，课程文件中的国民教育教材举隅，讨论的例子都是非政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议题，如国旗国歌的认识、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等，即使是社会议题的讨论，如汽车业及高速铁路的发展，分析的角度却仍是传统的宏观的、大国家、GDP 导向的焦点。然而，即使是

早前香港本地就高铁的讨论与思潮，已更多地从每一个受影响的人的角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分析。由此可见，课程中的"国民教育"仍倾向重集体轻个人，缺乏人文关怀的精神，对于国内人口大多数的黎民百姓，如农民、农民工、弱势人士（如上访者、维权者等）倾向视而不见。

再者，公民教育包含多元的身份反思与教育。例如，即使我们作为中国国民，但在思考不少社会议题时，例如资源的开发（应否廉价买入缅甸的木材，换取我国山林的保育）、或是自由人权的事件（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上，不可能舍弃"世界公民"的身份去思考与抉择。另一方面，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一直与国族身份认同相互拉扯，虽然内地经济急促发展，亦未能大幅收窄。如果以为是"国民教育"力度未够，未免太天真太傻。相反，惟有让新一代掌握多元公民身份的分析工具，明白多元身份不必相互排斥，同时批判可以爱国，才是真正有利是香港及国家长远发展的公民教育方向。

我们原有的"公民教育科"、"通识教育科"，其实早已包含了更开放包容，视野亦更开阔的公民价值教育。现在，是否要将狭隘的"国民教育"，进一步塞进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室里？放弃让我们的年青人，继续作为国际城市全球公民的一份子？

如果"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真的要证明课程是有包容性的"国民教育"其实等同公民教育的话，请教育局在提供的教材举隅中，敢于以六四事件、处理维权人士等等反映中国政治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事件为议题，展示如何培育学生积极面对中国的问题，从而思考解决方法积极推动国家进步。

如果"国民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一批可以让当权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还是要培养一批虚伪犬儒只懂揣测上意的机会主义者？这或者是短期"维稳"的好方法，但对国家的健康发展与及人民素质的提升，又有何贡献，香港要走这条路吗？

后记：

这篇文章写于 2011 年 5 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咨询稿公布之初，及后，社会大众对课程询咨稿表达了强烈质疑。然而，2012 年 5 月教育局在没有公布收集所得的咨询意



见内容下，直接发出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正式课程，并要求小学及初中必须要独立成科。虽然在正式课程中，对一些最具争议的课程文本写法作了修订、抽起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学及评核举隅，也增加了“争议性教材的学与教”的附件，不过，课程以狭隘的国民教育为课程基础的原则并未改变，因而上文的批判仍然成立。而事实上，随之引发社会更大规模的反对及要求撤回行动，正是课程缺憾的最佳印证。

（张锐辉，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研究部主任，中学通识科教师。本文系作者赐稿。原载于《明报》2011 年 5 月 17 日刊。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7131）

拓展阅读：谭蕙芸：学生要向政府说不——加拿大模式国情教学

【返回首页】



【借】

8-3 龚群：新加坡公民教育反思，好公民必须独立思考



“道德人格形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点是，道德人格形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既相对独立，又有相互联系。人格教育涉及到学生的内在品质， 例如尊重、关怀、体谅、正直，这些品质将推动学生向着正确的行为发展。他们强调在人际关系中、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个人与学校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 系意识中培养与建构自己的人格，发展自己的道德品性。 ”

新加坡的发展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在 2000 年左右，关于新加坡创造的奇迹有一些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加坡公民教育做得非常好；另一种观点则指新加坡是靠重罚的力量才有这样的发展。

新加坡“公民道德”有独特内涵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重视公民教育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重视公民教育，在于新加坡政府把公民素质看成是它的立国之本。因此，提高人民的素质是其基本国策，国家的硬实力体现在经济实力，软实力是文化。



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新加坡廉洁高效的政府、外来投资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时，整个国家的公民道德建设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他们认为，道德教育之成败，影响国家之盛衰。李光耀反复多次强调这个问题。

新加坡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指出："良好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基础，而道德教育的成败，不但关系到人性的善恶，生活的素质，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新加坡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民主与法治如不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恐将无法健全发展。"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起飞，与他们那一代人的道德价值观是分不开的。他说："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准低落，新加坡就会日渐走下坡。因此，我们是否能保持稳定和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在于社会的道德结构。"

在新加坡的政府与人民看来，公民道德是新加坡国家的宝贵财富。新加坡人的道德素质是新加坡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基础。新加坡把人的基本道德要求称为公民道德要求，当前新加坡的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名称，也就被称为"公民与道德教育"。

从理论上看，"公民"是现代国民的身份，是具有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单位。在现代法学中，公民是指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在法律规定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公民概念的意义上，对于公民道德可以有两重理解：一是仅限于公民作为现代宪政政治体的成员而应有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具有怎样的道德素质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国家)的国民所应有的基本道德。在后一种意义上，也就是从道德人格意义上讲一个人所具有的道德。换句话说，一个好公民在某种意义上应是一个好人或一个善者，或作为公民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具有的所有道德因素。我们认为，新加坡的理解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上的理解。

怎么理解公民教育或者公民道德教育？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的日本公民教育也就是国民教育，有的地方就把公民叫国民。从西方来讲，公民就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就有两种理解，一个是可以从政治意义上谈，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从国民意义谈就不一样了，国民就是我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我们认为，新加坡是从后一种意义——— 国民意义来谈，新加坡现在是两个概念合并，也就是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新加坡的公民教育重在作为一个国家国民的责任教育，一般而言，道德教育在于培养有道德的个人。在他们看来，公民

教育与道德教育可以重合。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从公民的权利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的公民观来看，这是两个不同教育领域，是不能重合的。在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意义上，有道德的人，也就是一个对他人关爱，对社会有责任心，对国家有爱国心的人。因此，有道德的人所讲的道德，就是一个好公民所要求的道德。换言之，新加坡所讲的"公民道德"，是从一个人的基本道德素质意义上讲的，但从公民角度讲，则更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新加坡人的公民就是说，你要对国家负有责任，而且你要对社会有相应的责任感，这两者加在一块就叫"公民道德"。

巴赫德强调十二价值项目

新加坡是怎样重视它的公民教育的？自 1959 年新加坡自治到 1978 年，新加坡政府重新反思自己的道德教育，这可称为第一阶段。从 1978 年至 1982 年提出推行宗教课和儒家伦理课，为第二阶段。

联合国推行的人类社会 10 个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如善良、诚实等等，现在是全世界推行。新加坡 1959 年开始就已经有伦理教育，当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素质要求。

新加坡 1967 年推行公民教育，取代伦理教育。这个时期的道德教育的教材即为"公民教科书"。中学"公民教科书"教材与伦理教育相比较，增加了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教育。新加坡的公民概念我不是很认同。

"公民教科书"(《好公民》)的教材涉及到个人健康、品性修养、不同层面的社会群体、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方方面面。这种"公民教育"的含义比较笼统，后来新加坡把个人成长方面的道德要求的教材改为"生活与成长"，再把对国家的认识等内容分为"好公民"教材内容，这样做了一个区分。

1974 年，新加坡政府在小学积极推行"生活教育"。1978 年，政府对于新加坡的道德教育给予了空前未有的高度重视。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发表《教育报告书》，指出学校的道德

教育做得很不够。因此，特地委任以王鼎昌部长为首的道德教育委员会研究新加坡学校的道德教育问题。

新加坡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真不多。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发展到这么好的程度，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有两方面：一个是文化素质；一个是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好的？现在新加坡也在反思，新加坡下一步目标是高雅社会，就是把文化的意义提上去。他们讲，人的道德素质和伦理素质要上去，如果道德素质走下坡，国家经济必定走下坡。

1979 年的《道德教育报告》是新加坡里程碑的东西。建议废除小学的"生活教育"与中学的"公民"，以"道德教育"取代，在内容上须包括三个方面：个人行为；社会责任；效忠国家。后两者就是他们公民教育的内容。实际上，在王鼎昌部长的《报告书》中，提议巴赫德博士出来组织一个策划组，推出新一代的道德教育。巴赫德博士被任命为教育部道德教育顾问，于 1979 年底成立了《新加坡中学生的道德价值观》的研究组，依据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重新编写新一代的道德教育教材。

巴赫德经过调查，发现新加坡道德教育存在问题，我觉得他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实施意见没有解决问题。他看到新加坡道德的问题是：一、没有培养真正的"好"公民。好公民必须是独立思考，具有高度理性、崇高的道德信仰、道德原则、群体意识、社会意识和献身精神的人。二、以前的道德教育缺乏人的真正品质的培养。一个具有真正光辉人性品质的人，能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具有从内心出发的深挚爱心与信念的人。但是，家庭和学校中侧重的只是教导表现的纪律、礼貌、负责任。三、缺乏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指导。

巴赫德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新加坡政府治国采用的是"功利主义"，经济挂帅的政策。这种政策上行下效，影响了学生、教师和家长的价值观。他指出，政府动不动就以法律制裁做后盾，来推行一切政策和社会运动或维持社会法律秩序，但政府并没有呼吁人们建立真正的自我约束的道德行为。法制制裁只能使人惧怕什么，而不能使人从内心建立起自觉维护道德意识。这两者都导致了道德教育出现严重偏差。

巴赫德对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套被认为是应当在学校中教导的价值项目。



这些项目是：对人类，应培养学生的"人类爱"，即博爱精神；对国家，应培植认识尽忠报国、效忠不二的价值观念，使权利与义务并重；对民族，应培育学生体会认同感，责任感与荣誉心与民族自尊心的意义；对社会群体，应灌输民主、公正、公平、和平、公德心、公共心与劳动服务的正确价值体认；对宗教，应灌注虔敬的态度。新加坡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世界三大宗教在这么小的地区相安无事，非常值得研究；对家庭：应栽培爱家庭、睦邻与负责任的心理意识，继承东方重视家庭伦理的传统美德。在这方面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地向新加坡学习；对父母，应教导感恩图报的孝、敬的东方传统意识；对兄弟姐妹：应培植了解互助互爱，亲切同情的健康意识；对下一代，应厚植慈爱扶掖，负责养育之至圣情怀；对学校团体，应灌输归属感、合群、守规则的习性，体认其价值性；对事物，积极的价值观应是认识进取心、创造与革新的精神，勤奋以赴恒毅不屈，刻苦耐劳的重要性；对个人，在积极方面，应确切让学生体认向上心、探究心、雄心壮志的价值所在，以及自尊自强的重要性。

这是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的总纲，这十二项内容值得研究。

新加坡公民教育存在缺憾

1980年，新加坡教育部先后成立了两个小学道德教育教材编写组，编写《生活与成长》和《好公民》。两套课程都以《1979年的道德教育报告书》和巴赫德的调查报告为依据。从此，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念。

1982年至1992年，新加坡推出儒家伦理教育，可以看作是其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第三阶段。1992年儒家伦理课叫停至今，为第四阶段的公民道德教育。由于宗教进入学校的情况引起政府的忧虑，儒家伦理课被叫停，从而重新回到原有的体系，其特点是将公民与道德教育合并。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而后在1993年左右，又发表了《家庭价值观白皮书》，是以国家国策的名义发表的。



就新加坡而言，学校是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主战场，学生是在学校接受教育，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而且是以全社会的方式动员，不同的运动方式进行，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使得道德教育由虚变实。他们的教育不仅仅只在课堂上，而是以多种活动培养社区精神；举办形式多样的文明礼貌活动；以多种合作形式进行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也是常见的渠道。

法律与道德相协调，营造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环境。新加坡政府在亚洲是真正最廉洁的政府。

新加坡为什么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和辉煌？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原因。我们提国家软实力，第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第二重要的就是国民素质。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一个衰败的社会、一个彻底腐败的制度要抵消多少国民生产总值？我认为，廉政建设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官员大量腐败，公民的道德教育收效必定受到严重影响。

道德人格形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点是，道德人格形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既相对独立，又有相互联系，人格教育涉及到学生的内在品质，例如尊重、关怀、体谅、正直。这些品质将推动学生向着正确的行为发展，他们强调在人际关系中、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个人与学校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意识中培养与建构自己的人格，发展自己的道德品性。

新加坡公民教育中对于人格教育看得很重，健全、正直的人格是做人的基础，也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重视道德教育也就是重视公民教育。然而，公民教育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必须能够使得公民有着自己的公民意义。公民意识不同于道德意识的地方在于，公民应当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道德教育所提供的是作为公民的道德素质，但不是政治素质，虽然它对公民的完整理解来说是很重要的。

成为负责任的公民。这种公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强调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强调对于国家的效忠。新加坡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特点，国情教育或通过国情教育而培育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十分重要。



这两点指出了新加坡公民与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和教育的全部指向，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围绕这两个轴心，就是培养对家庭、对社会和对国家负责，这种公民必须要有道德的基础，这是为道德人格的培养所造就。如果没有一定的道德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对社会的责任心、对国家的忠诚感，在这个意义上，新加坡的教育设计是完全合理的。

问题在于，新加坡的公民教育是把国家与政府混为一谈，对国家的忠诚也就是对政府的忠诚。同时，新加坡的教育是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这样就等于把政府与民族混为一谈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民族，也就是忠于政府，必然形成人们对政府的盲从。如果政府决策有错误，公民该怎么办？效忠政府的教育不可能培养有批判性思维的公民，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是现代政府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

从洛克的观点看，国家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如果政府不具有这种功能，它就没有存在意义。政府处于公民的制约与监督之下，政府的服务功能是它存在的理由。如果我们把政府的服务看成是对个人的施舍，个人只有感恩，无监督更无批评之理，这完全颠倒了。

新加坡的这种价值倾向体现在《共同价值观》。李光耀说："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国会议员许南山说，"只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才值得人们将它置于个人之上，如果社会是腐败的，但人们仍将它置于个人之上，那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这里所说的"社会"也就是掌握国家命运的政府。如果好政府尊重人的权利，能够给社会带来正面的东西，这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如果这个政府是腐败的，这样做本身是危险的。

（龚群，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0 年 2 月 8 日刊，为作者演讲稿。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5/22/52258718eca3c364/Blog/99f/c9674a.html ）

【返回首页】





8-4 刘常庆：德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经验与趋势

——访德国汉堡大学蒂尔曼•格雷莫教授

"1945 年以后，德国教育界就已达成了一种共识：一方面，公民教育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另一方面又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公民教育课程对校园文化和氛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一个民主的学生自治会有参与学校事务决策的强制性权利。学生们也应该参加社区活动，比如，参加社区服务、协同学习、为公共事务建言等。同时，德国的公民教育又是多学科融合、与生活相关的公民教育，通过历史、政治、公民、社会科学、地理等学科实施，也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其他领域实施。**"**



（蒂尔曼•格雷莫(Tilman Grammes)，德国汉堡大学教育、心理与人文学院教授，《社会科学教育杂志》主编。作为德国知名的公民教育研究学者，格雷莫主要关注和研究公民教育、民主与教育、欧洲教育、历史教育、全球教育、课例研究、学校商业道德及政治教育，代表作有：《德国的公民教育》《交际课程论：政治、历史、法律与经济》《非政治性的社会研究课——促进社会常识课和政治之间的关联》《学生视野下的社会》《政治教学论的实践：多视角下的教学分析》《公民课：教学记录的政治性教学评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学校争议》《政治教学中的行为取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学》等。）



一、选择公民教育：偶然与必然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您大学毕业后曾在一个商业教育机构做助理，后来在汉堡大学从事德国公民教育的研究和教学，在该领域耕耘多年，造诣深厚，成果卓著。首先请您谈一谈自己是如何将研究重点转向公民教育的？

格雷莫：实际上，这个转变是比较偶然的。我大学本科阶段就读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中文理师范专业，专业方向包括社会学、哲学概论和历史。硕士就读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专业为教育学。之后在柏林施特格利茨区坦伦堡高中担任实习教师，教政治。但在公立学校中，政治课不像历史课那样是核心课程，也没有很高的声誉，学校不需要太多的政治老师。最重要的是，在我原来就读的(西)柏林自由大学，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是激进的左翼份子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般都不想到政府部门去做公务员。因此毕业后，我最初选择到一所私立学校任教，教法律文员如何打字，尽管我自己都不怎么擅长这项技能。

在今天的德国普通教育中，恰恰有一门课程将经济教育和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在一些州被称为经济与政治(Wirtschaft und politik)，内容涵盖法治教育、经济和社会学。这正是我感兴趣的领域。1968 年的德国学生运动使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政治经济学得到一定传播。但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学校里却出现了减少经济学课程、转而教授市场经济理论的趋势。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狭隘，在德国宪法中，德国经济体系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不是"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而是工人与厨师结盟产生的所谓"莱茵资本主义"。我们应该教会学生批判地去看待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并且给年轻人自己判断的机会。请记住：德国是马克思出生的地方。

我很想知道今天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是如何通过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来了解有关公民或政治事件的。这就提出了有关价值观的问题，经济教育是离不开道德教育的。我和德国埃森大学的同行托马斯•瑞兹曼(Thomas Retzmann)就曾一起开设过商业和经济伦理课。其中有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专题，专门讨论专利问题。我非常想在亚洲开设这个专

题，看看会有什么效果，或许还可以通过跨文化的远程视频录像课，与上海的老师一起教授这门课。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创新”和“产权”等概念有不同的看法，这门课程或许会更有意思。

二、德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及特点

《世界教育信息》：我注意到在您的谈话中，并不总是使用“公民教育”的提法，也使用“政治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更接近思想政治教育．而政治教育是另外一门学科。您为什么还使用“政治教育”这一提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格雷莫：这看起来非常荒诞，但不幸的是在教育科学的文献中，”政治教育“这种称法依然刻板地保留着。从历史的角度看，1945 年前，德国不存在专门的“政治教育”课程，这部分内容隐含在基督教教育或历史课中。基督教教育在 19 世纪的学校中影响巨大，在州立学校中由牧师专门授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四个同盟国的倡议之下，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军事占领区倡导的所谓“再教育运动”之下，以政治教育(信息)为核心的、更为细化和明确的课程观念才被提出。当然，核心思想在于防止任何一种纳粹独裁思想的复辟和‘大屠杀’悲剧的重演，这也正是德国教育的最终目标。从那以后，政治教育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尤其是现在，德国还开展了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所谓‘民主教育’的运动，它涉及到国际教育改革的根源。这项运动关注的焦点在于建立民主的学校精神，同时鼓励年轻学生参与社区活动。这项运动在幼儿园和小学就已经开始了，比如一群孩子讨论怎么摆饭桌。”

也许是翻译上的问题，人们总是分辨不清“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关于“政治教育”这个概念的翻译，我本人的看法是：在很多国家，如果将“政治”与青年人的教育联系在一起，它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词语，因为它常常意味着“政治灌输”。但是在德语中，“政治的”或“政治”是一个中性词，并无感情色彩。翻译的困难在于，德语中有两个单词指代“教育育”——Erziehung 和 Bildung。德国的政治教育强调自我教化(Bildung)在塑造价值观念和个性方面的重要性。诸如母亲教育(Erziehung)她的小孩，而学校的老师则教育(Bildung)他的学生。因

此，在德国，我们倾向于用 Politische Bildung，而很少使用 Politische Erziehung，后者主要用来指 Erziehungsstaaten(国家政治教育)，如纳粹专政教育。很不幸的是，在全球教育领域，Politische Bildung 还是被翻译成了“政治教育”。其实相对应的翻译应该是“公民教育”，是一门有关政治科学的公民学科。

《世界教育信息》：当我在阅读德国公民教育的文献时，发现有学者用多元(diverse)和自由(1iberal)这两个词来描述德国今天的公民教育，您是否赞同?

格雷莫：公民教育确实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有很多民间机构都在致力于非正式的公民教育活动。不同的政党都在促进公民教育的发展，工会和行业协会也对公民教育的课程影响很大。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致力于和平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欧洲乃至全球教育以及人权教育。德国公民教育的确具有多元性。从理论上讲，多元化的信念是必不可少的。但定性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那些本想讲授具有争议性、多样和开放的政治问题的老师，事实上却将其转化为封闭性的问题，或者转化为相对论式的问题，这是不妥当的。对世界各国的老师而言，这都是普遍存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1945 年以后，德国教育界就已达成了一种共识：一方面，公民教育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另一方面又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公民教育课程对校园文化和氛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一个民主的学生自治会有参与学校事务决策的强制性权利。学生们也应该参加社区活动，比如，参加社区服务、协同学习、为公共事务建言等。同时，德国的公民教育又是多学科融合、与生活相关的公民教育，通过历史、政治、公民、社会科学、地理等学科实施，也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其他领域实施。

《世界教育信息》：德国是有 16 个州的联邦国家，有 16 个教育部。各州之间的公民教育有何差异?当前各州公民教育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格雷莫：联邦制和州政府自治是德国宪法规定的核心规则，在文化事务上尤为如此。当然，这样的规定来源于纳粹独裁专政集权式的”国家教育“的教训。但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争论教育体系是否应该更加中央集权化。PISA 的数据显示，德国南部各州学生智力发展要比北部的学生早一个学年。对此我深表怀疑，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就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不公。

另一个就是德国学校系统的发展轨道问题。一个由社会民主党或生态学家组成的'绿党'执政的州，会倾向于建立具有包容性的综合学校，或者至少是一个与社区学校或健身中心融合的双轨制学校；而一个由自由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执政的州一般会固守传统，采用多层次的学校体系。

《世界教育信息》：当谈到政治教育的时候，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带有男性特权意识．据了解．在德国也存在类似观念．那么今天德国的公民(政治)教育是否会特别关注女性的感受?

格雷莫：事实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一位可以激励女性参与政治的很好的榜样人物。德国学校里设有"女生节"，为了体现性别平等，最近又设立了"男生节"。各种机构中也有"女性代表"，现在被称为"平等授权代表"。事实上，就平均水平来看，女生在学校里的表现要比男生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人关于弱势学生的固有印象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金发农村女孩"，现在却变成了"信奉穆斯林教、移民过来的黑发城市男孩"。

在小学里，我们没有足够的男老师可以成为男学生的榜样，因为教师职业变得越来越女性化，尤其是德国的小学老师，不仅收入不高，社会对这职业的认同度也不高。因此，德国设有专门的项目来激励有天赋的男生选择小学老师这职业，而不是去做技工或医生，但收效甚微。

《世界教育信息》：从整个德国公民教育的情况看,您觉得德国公民教育的效果如何?

格雷莫：当然，在教育方面永远没有满足。但是定性的研究可以向我们展示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明显的缺陷。

最为普遍的是"教化"和"道德价值观教育"的区别问题。教化意味着向孩子灌输一种具体的观念和习惯，例如"使用原子能是有利有弊的"这类有争议的问题。就公民教育而言，通过辩论和使用不同的标准，让学生形成自己的观念是非常必要的，例如，使用原子能的代价是什么?哪些人在鼓励使用原子能?法律上有什么相关规定?等等。

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缺陷是我们告诉学生太多的正面信息，而阻止了他由实践而习得的思想和行为的作用的发挥。当然，当我们判断"要不要使用原子能"这样的问题时，需要了解很

多事实。但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又都是有争议的，一个专家表示数据是正确的，而另一个专家却可能认为同一个数据是错误的。但是，一堂课只有 45 分钟，当学生了解了基本事实以后，这节课就要结束了，因此他们的判断、辩论以及推理的能力无法得到锻炼。

三、目前德国公民教育研究的难点与重点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关注的主要是东德的公民教育，并著书专门论述,为何选择东德的公民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东西德的公民教育有什么不同?您怎样看待今天东德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研究的难点在哪里?

格雷莫：这是一次历史的机缘巧合。绝大多数西德政治课老师都曾帮助过民主运动中的东德同事塑造西方政治体系和公民文化观念。其中，(西)德国政治教育中心的影响最大，它曾开发当时大部分的教师培训课程。

东德和西德的公民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课程上存在明显区别，西德的学校不开设像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课程。乍一看，东德政治教育与马克思和列宁言行、共产党决议、马列经典著作相一致，并非简单的诠释，非常规范。但再一看，你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学生和老师情不自禁地开始怀疑，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课本上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因此，很多学生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双关对话”，回答老师愿意听到的答案。这种态度必然导致道德教化体系的崩溃，但是我们又无法避免。

对于东德的公民教育，我认为司题主要在于方法论上：人们不应该错误地仅仅通过官方文本，诸如政府课程体系或者官方的教科书等来评判教育制度，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规划和现实的不同之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要去找到原先课程的录像带，通过些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去找以前的学生、老师和父母聊天，研读一下他们的笔记等等，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这些材料。

有时候，通过个案例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史上已经将东德教育标记为一种典型的“国家教育”和“参与式独裁”，众多公民参与在社会主义民主中制造了社会

主义假象。“狐狸与酸葡萄”的故事可以用来借喻冷战后期的情景。有德国老师在课堂上借用“狐狸和葡萄”的故事来唤起学生的民族和爱国情感。然而仅仅列举一个案例是很困难的，你必须做出谨慎选择，这是研究难点之一。是选择从东德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的内部体系进行解释，还是假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式是不正确的，选择在其之外进行外部解释。如果你在西方国家进行宗教教育的研究，也会发现有同样的问题存在。人们对案例的解释会因为研究人员假设上帝是存在的，或者上帝是不存在的，而有很大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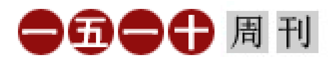
《世界教育信息》：在从事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同时，您还担任《社会科学教育杂志》的主编，《社会科学教育杂志》近期刊登的涉及公民教育的文章主要关注和讨论公民教育哪些方面?

格雷莫：最近的《社会科学教育杂志》关注的话题主要有可持续发展、金融危机、定性研究、社会科学的素养与学习、利用新媒介让政治教育形象化等。作为编辑，我们感到有些担忧，我们从全世界的作者那里收到的论文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狭小，而且大多数是定量的实证研究。这是因为为了能够进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我们的杂志采用双盲审制度。但是定量数据并不会“告诉”教师什么，对教师来说往往没有任何意义。

好在教育科学领域还存在对传统教育的反思。我们知道定性的个案研究可以让我们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因此，《社会科学教育杂志》最近设置了一个经典历史案例的栏目。有人认为，就专业知识而言，一个便于理解的案例可以比“PISA 工厂”和径合组织提供的数据有效。《社会科学教育杂志》也非常希望收到来自中国的公民教育课堂的案例。

四、教育国际化：大规模教育评估的影响与国际经验

《世界教育信息》：今天我们能到德国来和您讨论德国的公民教育问题．得益于教育国际化潮流。德国作为欧洲的一个大国．是否也遇到公民教育国际化的问题?德国是否也有意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国际公民?



格雷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经常以所谓"同心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年轻人总是从身边的事物开始学起，然后再联系到联邦国家以及欧盟，最后我们会给他们介绍国际的和全球的视角，甚至联合国。以这种同心圆式的思维模式来看，欧洲公民处于夹层中，不里不外。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亲身感受到欧洲化的存在。不幸的是，这些感受往往是负面的，比如，欧洲的官僚主义。然而，欧盟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比如没有了国界，人们的活动和旅行都很自由，这些都被年轻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德国的教师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培训来很好地解决城市课堂上巨大的异质现象。在汉堡，班级中有超过 50％的学生是移民，有些班级甚至超过 80％。德国的老师一般认为这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但是对于真正的和训练有素的公民教育家来说，这却是普及世界大同思想的资源和优势。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一名研究公民教育的专家，您不仅具有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和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还曾经走进中小学课堂，考察过日本，撰文介绍美国的公民教育。您对这两个国家的公民教育有何感受?通过比较与介绍这两个国家的公民教育，您希望给德国的公民教育带来什么改变?

格雷莫：我们经常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诸如 PISA 和 TIMMS 包括了一个定性研究的部分。TIMMS 就日本、美国和德国三国的数学教育情况进行了比较，调查发现，这三个国家的学生对师生在课堂上的作用的看法各不相同，而这些看法与他们所受的公民教育有关。德国有一种致命的传统教育模式：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老师给出评价，然后老师提出下一个问题，如此反复，过程甚至可以持续 45 分钟。但这种课堂模式是没有实际效果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没有结果的测验"，因为学生会回答老师期望得到的答案。日本和美国的课堂则不同，日本学生要么自己独立完成学习，要么以小组为单位学习；美国老师在课堂上则主要是为学生提供服务。

《世界教育信息》：你刚刚谈到了 PISA，据我所知，德国学生的 PISA 成绩并不是很优秀，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的关注，这会不会影响德国公民教育的方向?或者说公民教育会不会循此而改变?



格雷莫：有很多教育科学家都不相信我们所谓的"PISA 工厂"和它致命的教学评价态度。作为一种教育统计架构，PISA 测评结果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作为公开讨论教育政策的论据。但是，PISA 的测试结果真正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是否应该将普通教育的课程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诸如母语、数学和第一外语等所谓的"核心课程"上?还是反其道而行之，鼓励开设艺术、音乐和戏剧课程来培育学生的创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定量数据显得含混不清，甚至可以说毫不相干。

五、对中国公民教育的建议：博特斯巴赫共识

《世界教育信息》：国际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中国教育界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一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您也曾经到过中国．与中国师生进行过交流，你觉得中国的公民教育应该在哪些方面向德国借鉴经验?您对中国的公民教育发展有什么建议?

格雷莫：我曾有幸到上海的一所中学参观考察，那是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但我不能仅从这一个案例就得出有关中国公民教育的结论。进一步信息有待我从《道德教育杂志》中了解。

谈到对中国公民教育方面的建议，我会想到"博特斯巴赫共识"。这也许是德国在公民教育方面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但我同时也在想，在儒家、道家或其他中国哲学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博特斯巴赫共识"这样的思想。这个"共识"可以说是德国公民教育教师的"圣经"，它包括以下三个主要的原则。

第一，禁止灌输。不允许教师用任何手段对学生进行灌输，因为这会妨碍学生独立判断的形成。这是"政治教育"和"灌输"的区别所在，因为"灌输"与民主社会的教师角色不相匹配，也与被普遍认可的、学生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教育目标不相符。

第二，保持争议。在科学和政治上有争议的一切内容，在教学中也必须保持争议。这与第一个原则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打击争辩，压制不同的观点，就会重回灌输的老路。人们经常担心，教师的政治观点会以各种形式对学生产生影响，比如教师处理当前政治问题的方式，特别是在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时，给学生下明确的结论。这就要求教师的个人立场，无论是政治观念还是科学观点，都必须是中立的、客观的，与其本人观点对立的观点也应该被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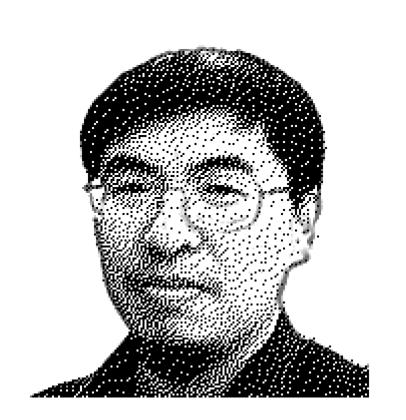
第三，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维护个体利益的能力。政治教育必须使学生能够分析政治形势以及他自己的相关利益，能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寻求影响既定形势的手段。这种原则强调学生需掌握一种操作性的能力，是前两个原则的逻辑结果。

（刘常庆，《世界教育信息》特约记者，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德国汉堡大学访问学者。本文原载于《世界教育信息》2011 年 12 月刊。原文链接：
http://www.wei.moe.edu.cn/c113/0106/content_012007106a20071p1.html）

【返回首页】

8-5 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

——以商务印书馆的公民教科书为例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

一

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 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 8 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罗马共和时代，到 16 世纪，公民教育在欧洲随国家思想而勃兴。[1]“由国家大规模的担承近代意义的公民训练的学校之设施”则始于 19 世纪。[2]从那时起，公民教育不仅成为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标。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1924 年，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

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3]



1927 年，陈筑山概括了公民教育的三个目的：

一、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故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实应今日国家的根本要求而立。”

二、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逞私见、好私斗，重私德，轻公德，“处今日公共生活很发达很复杂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性的弱点，非从根本上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团体道德不可。故公民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实为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病症而立。”

三、 “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故公民教育的第三个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4]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无论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还是留在国内的张元济、严复、蔡元培这些人，无论是办刊、办学，还是翻译、出版，他们的基本共识，都是要开启民智。开民智乃是为了造就一代新民，正是借助梁启超、严复的笔，“国民”、“权利”、“义务”、“平等”、“自由”、“自治”等词汇相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通过普及最广的教科书将这些思想播洒在幼小者的心中，这是百年中国转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期。

到民国早年，公民课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创办于 1909 年的《教育杂志》，终刊于 1948 年，三十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 80 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

然而，在以往的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搅动时代风云的思潮，那些一言而为天下法、享有大名的思想家、知识分子身上，对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尤其那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旨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断裂和遮蔽造成的。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晚清以来的修身到民国的公民教科书为例，结合《教育杂志》的讨论文章，观察 20 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在这块古老大陆走过的路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 1949 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教育杂志》也曾是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大致上看清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在萌芽、兴起、衰微的演变轨迹。

二

确切地说，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1912 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但此时“公民”还是与“道德”捆绑在一起，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严格地说，“公民道德教育”还不是普遍意义上“公民教育”，而只是新的“修身教育”，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晚清新学初兴之时，承接长期传统儒家教育，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 1904 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典范，初小 10 册为张元济所编，高小 4 册为高梦旦所编，中学 5 册为蔡元培所编，都署名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三人校订。

1896 年出生在贵州盘县的张道藩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读过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5]



其实，蔡元培编的修身教科书已经依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在“国家”一章大谈“人之权利，本无差等”，“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还专门有“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低，官员、医生、教师都要有职业道德。鼓励学生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等。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私德层面，更多的立足于公德，或者说开始强调公民修养，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所没有的。

初小的修身教科书共 10 册，每册 20 课，200 课中没涉及一个“君”字，300 个故事没有涉及一个“忠”字，大体上提倡宽容、公平、进取、尚武、信实这些价值，其中有三课“守法”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第八册 19、20 课讲“国民”。高小的 4 册，都是采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实，并附了现代的伦理。可以说，这些修身课本已具有某些公民教育雏形，虽然还拖着一缕道德教育的影子。有些研究者简单断定那时的修身课只是臣民教育，也许是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些教科书。

民国的创立不仅是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发难的结果，也与长期以来开启民智的努力分不开，可以说多方合力，最终水到渠成。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了很大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已呼之欲出。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 6 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

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这是《自由》一课：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人权》一课说：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

《中华国民》：

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

所谓修德淑性者，恭俭持躬，朴勤处事，入则孝弟，出则忠信，重人道，谋公益，遵奉国宪，惠爱群伦，平时则振起工商，促进文化，战时则踊跃赴难，发扬国威。

格言：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至于“尚武”在晚清就已提出，盛行于 1906 年日俄战争前后的军国民思想，即包含了

某些公民教育的因素，并不是民国才开始出现的新概念，《新修身》第二册有“义勇果敢”，第五册有“尚勇”，第六册有“义勇”、“武勇”。

1912 年 6 月初版，1917 年 6 月已出到 218 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其中第十一课是《选举》：

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

国会之外，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以议一地方之事。

议员代议政治，关系甚巨，故选举议员者，及被选举为议员者，皆宜慎重从事也。

第十六课是《平等》：

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

……故一国之民，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为军人，或为农工商贾，各就其性质所宜，任择一业，以自尽其天职。初无贵贱之分也。



第十七课《自由》解释，“所谓自由者，即天赋之人权是耳。凡人之身体财产名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营业家宅书信等，苟非依法律，皆不得干涉其自由。此人民固有之权利也。”并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

第十八课《好国民》：

集众民而成国，一国之兴衰治乱，视其国民之品行能力。故修身善行为爱国之本务。

对己则修德、力学……对社会，则敬老慈幼、救贫济困……对国则纳税守法，卫国爱众。如此诚为好国民也。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等，都涵盖于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1912 年 4 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第五条，“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第四册有一篇课文《民主国》：

“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国家大事，谓之民主国。”

第八册 53 课是《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民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不可不谨守之也。”

另有《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第 56 课《待外国人之道》说，“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编辑大意》比初小更为具体：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

连国民的参政能力都纳入编辑目标之中，这比“新修身”还要进了一步。难怪 1912 年 6 月初版的这个版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初入高小的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立宪的区别，这是政治常识的启蒙，一种典型的公民教育。

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

法儒孟德斯鸠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盖人民各以己意投票选举，以议一国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选定议员若官吏，则委以治理之权，而服从其下，故曰人人皆治于人。

昔者各国政体，多为君主专制。一国政权，恒握于少数人之手。又无法律裁制之。故及其弊也，万机丛脞而不能理，刑戮残酷而不能止。此尊重自由之民族，所不甘久蛰伏者也。反其道以行之，而共和政体成立矣。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叙述民国诞生的历史，另有介绍华盛顿、卢梭等异国领袖和思想家的课文。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 2560 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有各种原因，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 1915 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11 月 26 日张元济写给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信中说："敝处先将'共和'书更名'普通'，以为过渡时代之用，已送部复核[照审查图书规程令]"。



虽然做为过渡用的“普通”教科书删去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学龄儿童的心中，影响之深远，超过了那些议论高深的道德文章。

三

孙中山痛感国人如一盘散沙，连开会、动议、附议、表决都不会，亲手编写了《会议通则》（以后改名《民权初步》），1917 年 4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在自序中说，“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 也就是要教人学习做公民。如果论影响，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还抵不上那些公民教科书。就在这年 1 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一册，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 1916 年 10 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1919 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办法分两种：（一）宜编订公民教本，专为中小学校教授公民科之资料；（二）宜编订公民常识表解，专为通俗演讲之资料。议案获得通过，联合会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搜集公民常识资料，分门编订。[6]

1921 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专为改制后的小学高年级使用，杨贤江编、王云五、朱经农校的《新法公民教科书》2 册与计志中编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并行。1922 年 12 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也就是这次学制改革，正式取消了“修身”，初小改为“社会”，高小起改为“公民”。1924 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

公民教育运动，1926 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 5 月 3 日至 9 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 1929 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标准起草委员会编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于公民科规定很细致：

（1）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包括家庭及其组织、学校生活、同业组合、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个人的习惯、维持社会组织的原则。

（2）宪政原则，包括国家的性质、政治组织、代议制度、政府组织、人民权利义务、法律、公共治安。

（3）中华民国的组织，包括中华民国的起源、民国政府的组织、地方政府的组织、国宪与省宪。

（4）经济问题，包括生产原则、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消费和财政。

（5）社会问题，包括教育、职业、卫生、劳动问题、禁烟禁酒问题。

（6）国际关系，包括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国际关系的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组织。[7]

“新学制教科书”由 1924 年 5 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修身科所强调的“德性”培养，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8]



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 16 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第十六课《法治精神》在列举了人治的恶例之后如此解释：“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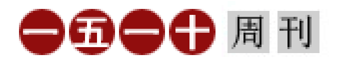
第三册第五课这样解释“代议制度的精神”：

就国会方面来说，议员要明白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无论议决的什么案件，都要以人民全体的福利为前提。就政府方面来说，第一，行政首领须将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务详细报告于国会；第二，所有法律须交国会议决，然后公布。就人民方面来说，人民虽则选出代表组织国会来执行政权，却不可因此卸责；一方面应当监督议员的言论，一方面应当做议员的后盾。这都是代议制度的精神。

第七课将人民的权利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叫政治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得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私权是个人以私人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所以又叫做个人的权利，分为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的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紧要的。此外，人民还有法律上平等权，书信秘密之保有权，请愿权等。同时也指出，人民虽有自由权，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或危害公安为限；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有权干涉了。

第十一课《大总统》，“至于大总统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来说，民国大总统经由内阁行使职权，政治的责任有国务员代负，他用不着去负的。民国法律是平等的，大总统犯法，法庭一样的可以拘拿治罪。故法律方面，大总统是要负责任的。”

第十六课《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



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小学校之公民教育》，为小学的公民教学设计了一张简明图表：[9]

这个图表是根据教科书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概括出来的。1924年6月初版的还有一套四册高小用“新撰公民教科书”，万良浚、魏屏三编，王云五、李泽彰校，用浅显的文体文编写，与白话的新学制教科书系列并行，《新撰公民教科书》的《编辑大要》与“新学制”几乎完全一样，内容也大致一样，第一册的许多篇目相同，比如“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只是“新学制”纯用白话文编写。新学制的初中公民教科书是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四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1928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1933年到1934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4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





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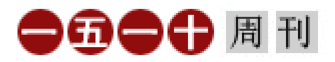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公平竞胜》提出：“第一要严守各项规则，二要态度公正，举动光明，尽自己本领努力竞争。三要服从评判员的裁判，不可妄加指摘。四要和竞争对方始终维持友好态度。五要谦和快乐，胜不骄傲，败不懊丧。”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1933 年 7 月出版，11 月已印 70 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民主政治是舆论政治。国民既将政权委托于政府，政府的设施是否正当，还要取决于国民。国民对于政治的意见，叫做舆论。国民真正的舆论，政府应当采取，作成法律，期其实行。

舆论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见。一个政党的意见，不是舆论。一个报纸的主张，也不是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国民几经讨论而后成立。国民关于舆论，应当有尊重少数和服从多数的精神。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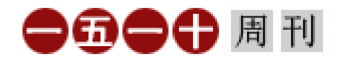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1923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10]

他高中毕业于1940年，1937年之前读初中，读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的公民教科书。他说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多少人还能在未来的人生中忆及公民课给予他的训练？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包括李慎之在内，那个时





代上过公民课、接触这些课本的少年，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中国 50 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11]

五

1937 年 3 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从课本来说，比以前的更贴近学生，更为成熟了。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的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语文课的国文，不独可使我们能明白清楚地叙述事理，表达情意，而且可从中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外国文，使我们得由外国的语言文字中了解外国的事物情况。又如历史地理，不但使我们明白本国与外国的历史事实与地理情况，且可激发我们的爱护国家、爱护民族的观念。这些知识，可说没有一种不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做课业的活动，直接是学习功课，间接乃是培养公民道德。”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



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

1939 年，罗廷光在《教育杂志》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即带有浓厚的党化教育意味，与商务版代表的公民教科书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已有很大差异：

确认三民主义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理想，也便是中学实施公民训练的无上准则。……本此以实施训练，则：第一，中学生须认清“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第二，彼等在公民科及其他有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问题等）上对他种主义尽可多方面研究，但以不离乎三民主义的立场为是。……[12]

从修身课到公民课，重视公民教育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营出版机构的一贯宗旨。针对小学公民教育，不仅有教科书，在配套的“小学教育从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之理论与实际》，“师范小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概论》，“小学教师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教材和教法》，此外还有《学生自治须知》、《公民教学法》等，“小学生文库”中除了《国家浅说》、《政治浅说》、《民权初步摘要》、《民权主义浅说》、《法律》等，另有一本叫《好公民》。在“民众基本从书”中也有一册《怎样做公民》。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怀疑虑，“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全面爆发，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1942 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 1940 年 7 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参阅者”名单包括朱家骅、吴铁城、陈果夫、陈布雷等要员，官方聘请的梁实秋等专家，

出版家王云五虽然也名列其中，主导权已转移。尽管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在，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公民训练、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在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因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党化教育的不断侵蚀、污染、异化，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此时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20 年代的黄金时代再也不可能重现了。虽然 1947 年 12 月汪懋祖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为中学公民教育概括了五个原则，那也只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不可能付诸现实：

1、公民的习惯与品性

2、公民的动机

3、公民常识

4、培养公民理性

5、树立公民理念和信心 [13]

抗战后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成都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他包教全校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的大概已是国定本。他说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晚年回想起来他深感惭愧，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所以 1997 年 11 月他在《改革》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 [14]

自 1949 以后，公民教育不仅退出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销声匿迹，以致今天许多人把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与公民课相混淆。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初中开设公民课，二十五年过去了，公民课尚未得到恢复。2005 年杨东平等编的小学版《新公民读本》出版，也未能使用，新公民读本的中学版则迄今未见

出版。今天，即使我们像李先生那样怀抱一个当中学公民课教员的梦想，也依然只能是梦想。

2010 年 11 月 6 日杭州

说明：此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程巢父兄帮我复印了 24 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新修身和公民教科书，凡来自这些教科书的引文，不一一标明出处。此外，还要感谢王小庆兄，他编的《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待出版）选录了《教育杂志》1909 年到 1948 年间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他撰写的前言也令我受益。

注解：

[1] 曾在幹《略论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8 年 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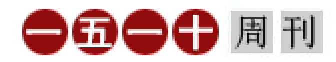
[2] 常道直《小学公民课教学法》，《教育杂志》1924 年 1 月。

[3]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 年 4 月。

[4] 陈筑山《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教育杂志》1927 年 9 月。

[5]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 1968 年。

[6]吴家镇《高时良现阶段中国公民训练之鸟瞰及其改进》，《教育杂志》1936 年 3 月。



[7]易正义《民国初年中学“公民”课程的建立》，《亚东学报》2009（29），转引自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8]彭基相《公民的训练》（译文），《教育杂志》1924 年 9 月。参考王小庆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9]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 年 4 月。

[10] 《李慎之文集》上册，62 页，自印本 2003 年。

[11]谢泳《1913 年的美国公民学》，165—166 页，《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

[12]罗廷光《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教育杂志》1939 年 11 月。

[13]汪懋祖《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教育杂志》1947 年 6 月。

[14]《李慎之文集》上册，53 页，自印本 2003 年。

（傅国涌，独立撰稿人。本文选自作者博客。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17x7m.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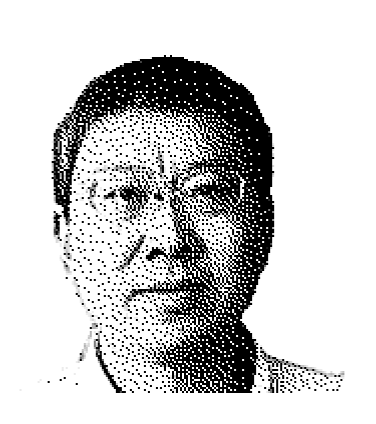
【返回首页】



【思】

8-6 徐贲：学校教育难以培养“好公民”

“其实，一般的国民或品格教育与民主政治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就像自由市场不但不一定带来民主，而且实际可以强化专制一样，国民或品格教育本身也完全可能被不 民主的制度所利用和同化，因而使得社会和政治的民主转化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民主政治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国民或品格教育，而且更是民主的公民教育。”



说起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的“全面发展”教育，人们想起的便是“德、智、体”三好。然而，这三好加起来是否可以把学生培养成好公民，却是一个疑问。有了“三好”，却不能培养“好公民”，不能不说是三好缺一好，而且缺的是最重要的那个“好”。

中国学校里的“德育”，除了意识形态的部分，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国民教育”和“品格教育”差不多。国民教育往往着重在国民义务和责任(纳税、遵纪守法、爱国、服兵役等等)，而不是公民权利(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选举权，公共信息权等等)。品格教育是一种将个人社会化的教育，日常生活秩序的国民教育一般会具体化为品格教育，涉及与平等、公平、尊重他人等等有关的待人接物的许多方面。

在美国，品格教育往往被称为“品格六大支柱”(six pillars of character)：尊重、责任、公平、值得信赖、关怀、公民责任。

在品格六大支柱中，国民教育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个人“品格”的，包括与他人共处、合作的伦理道德;在这之外，它还涉及到了一些“参与”的责任(在学校里、邻里街区或者更大



一些的群体)。当一个好的公民主要是具有优秀的品格、乐于帮助别人、不威胁或伤害他人等等，虽然也包括公民责任和参与，但显然没有充分强调。

魏赛曼尔和凯恩(J. Westheimer and J. Kahne)在《教育“好公民”：政治选择与教学目标》中指出，这种“参与”还算不上是具有民主公民意义的参与，“参与的公民”应该是“共同体组织和/或改善社会的积极成员”，他们不仅组织有助于社会和公益的活动，更“懂得政府机构是如何运作的，懂得如何去完成集体性努力的策略”。有效的社会参与需要公民有正义意识，“能够批判地审视现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不为它们的表相所迷惑。要能够发现并对待不公正的地方，而且还要了解社会运动并如何实现制度改革”。以美国常见的为穷人捐助食品为例，品格良好的“负责公民”会捐助食品，但“参与型公民”则会在民间形成公益或非政府组织，组织食品捐助;而“有正义意识的参与公民”则更会追问为什么在食品并不短缺、有的人花天酒地的时候，社会中却有这么多人还在挨饿。

这三种不同的公民行为后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公民如何共建“好社会”，而不同的行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不同的。第一种回答是，要共建好社会，国民们必须有优良的品格，诚实、负责、守法、响应号召。第二种回答是，国民必须积极参与，结成组织，自治、自理，补充和完善好社会所需要的制度。第三种回答是，国民的有效参与必须是公民行动，这不仅取决于公民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愿望，还取决于他们对现有制度中的不公正和非正义因素是否有所察觉，有所批判，并努力采取行动，予以纠正。

对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正义意识参与”来说，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的、政治的组织是关键的一步。针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公民只有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影响政府的政策。

参与型公民在公民教育中要学习的是关于政府和其他制度建制(如社群组织、非政府组织、教会、工会)运作的知识，这就需要了解民主权力的合法性、权力制衡、权利性质等有关知识，了解如何在民主制度中计划和争取达到自己权益范围内的目标和帮助别人的需要。这和凭个人品格所能做到的是不同的，参与者们自己会发起了这一社会活动，而不是等到有人号召他们才这么做。他们更不是随着政府权力的意志，被牵着鼻子地进行政府所规定的“正确参与”。

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乐于参与，是以这个国家的结社自由，尤其是政治结社自由为根本条件的，因为，“凡是不准政治结社的国家，一般结社也极少”。对于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托克维尔说：“一般结社有助于政治结社。但是，另一方面，政治结社又能使一般结社得到长足发展和惊人完善”，一般结社往往共办小事，而政治结社则都为共办大事，“共办小事情的次数越多，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越来越获得共办大事业的能力”。

公民教育，尤其是民主的公民教育与一般的国民或品格教育是有区别的。公民教育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师表率、与现实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运动的关系，都是与什么是公民、公民要做什么、谁来规定和推行公民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里，由政治权力主导和规定的国民教育往往成为实质上的安分守己顺民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期待国民教育自动带来民主变化，就像期待自由市场会自动带来民主转型一样虚幻，它严重低估了首先需要建立民主制度的迫切性。其实，一般的国民或品格教育与民主政治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就像自由市场不但不一定带来民主，而且实际可以强化专制一样，国民或品格教育本身也完全可能被不民主的制度所利用和同化，因而使得社会和政治的民主转化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民主政治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国民或品格教育，而且更是民主的公民教育。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原文链接：http://viewpoint.inewsweek.cn/columns/columns-1724-p-1.html）

【返回首页】



8-7 郭忠华：未竟的工程

"出于各种原因，开启于 20 世纪初的'国民建设'工程没有能走得更远，五四运动之后，以'斗争'、'集体'、'革命'为主轴的阶级叙事迅速替代了以'民 智'、'民权'、'民力'为核心的国民叙事。国民建设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国民建设的夭折使行进中的现代国民重新被纳入组织、集体和国家的大叙事中，只不过取代传统家族组织的是政党组织、取代宗族群体的是阶级群体、取代传统国家的是政党国家。"

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不仅应当阻止"文革"这种剧烈的政治创伤，而且也应当阻止公权腐败，至少是阻止巨贪、群贪这种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创伤。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时，人们从领导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角度进行了反思，但国民角度的反思尚做得不够。国家与国民互相依存、互为一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体制刚建立的时候可能十全十美，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国民基础，最终也会变得弊漏百出。反之，如果具备良好的国民基础，一种起初存在缺陷和弊端的政体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变得完善。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国民精神是一种更加持久的政治纠错力量。

中国国民建设的开端

擦拭和映照历史之镜，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国民建设的重要性早有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痛定思痛，深感国之大患不在于直接迫害自身的保守势力有多强大，而在国民奴隶性之积重难返。他说道："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1］国中虽有数万万之人，守国者实不过一家之人，其余皆无所不忍、无所不受、刺之不知、激之不动的麻木冷漠之人。这些人外不能"捍城御侮"，内不能"自



布政治”。反观已迈入现代轨道的西方国家，它们却把国家看作是“君民共有之国”，君民如父兄，如子弟，彼此通力合作，共治国事，从而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以中国一家之国敌西方数万万人之国，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身体力行，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力主“新民”之说，以提升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在他看来，“国也者，积民而成也”［2］，“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培育新民成为摆脱外来侵略、实现国家更始的根本手段。在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国民精神的基础上，梁启超把“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作为中国的新民之道。

在国运日颓、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的清季，梁任公的新民之说自然很容易赢得社会的共鸣。在他的倡导之下，形成一大批以国民精神相号召的救亡启蒙人士，同时，国民精神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振。迨到 1905 年左右，“国民”已成为国中人尽皆知的一大名词和行为准则。章士钊在描述当时的情形时说道：“近世有叫号于志士，磅礴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民。’”［4］清季重臣于式牧则对当时国民精神的蓬勃发展表现出几分蔑视和担忧：“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政、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5］

于式牧所言不差，批判的武器旋即演变成武器的批判，国民精神开始对现实政治形成强烈的冲击。这首先体现在始于 1903 年并持续至 1911 年的“保路运动”上。面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的铁路权，且不说绅商和普通百姓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团结，就连妓女、乞丐也都加入其中，出资认股，积极收归路权，民族自立、自强和团结的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 1920 年 10 月 25 日天津《益世报》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民精神在平常人心中的普及：一名人力车夫与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不知何故当街发生争执，面对学生的肆意詈骂，人力车夫回答道：“吾与汝同为中国国民，怎堪如此辱骂？我虽然只是个拉车的，毕竟和你一样同属人类，同享人权。先生在学校读书，难道不知道人人平等的道理？”［6］“人人平等的道理”，正是国民之理。但通过“人力车夫”之口道出，的确反映了当

时国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将贩夫走卒的一桩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见诸报端，则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于“国民建设”的良苦用心。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开启于 20 世纪初的“国民建设”工程没有能走得更远，五四运动之后，以“斗争”、“集体”、“革命”为主轴的阶级叙事迅速替代了以“民智”、“民权”、“民力”为核心的国民叙事。国民建设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国民建设的夭折使行进中的现代国民重新被纳入组织、集体和国家的大叙事中，只不过取代传统家族组织的是政党组织、取代宗族群体的是阶级群体、取代传统国家的是政党国家。我们或许可以把此后“文革”等政治灾难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7］这种畸变的领导体制，或者归结为“制度建设滞后”的结果，因为据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但问题在于，当时为什么没有能阻止畸变体制的出现呢？为什么没有能建立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的“好制度”呢？深层原因或许更在于“国民”，而不在于“国家”。设若清季民初的国民建设能走得更远，设若当时已经形成强大的公民社会，那么，纠正体制瑕疵的能力将会更强，催生“好制度”的力量将会更大，造成政治灾难的几率将会更小。国民建设的中道辄止对于此后的政治动荡实际上大有关系。

西方国民建设的启示

环视全球，中国的“国民建设”发端于西方现代性的撞击和启发。“国民精神”本来是西方民族国家用来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建立自己种族与文化优势的准则，但被梁启超、孙中山等与西方有接触的近代知识分子所认识和仿效，通过“创造性翻译”的方式引入中国，成为建构中国自身现代性的手段。西方用来维系自身优越性的话语变成了东方赶超西方现代性的武器。正因为如此，较之于中土，西方“国民建设”的历史更悠久、星光更璀璨、积淀更丰厚。在公元前 6 世纪到前 4 世纪的斯巴达和雅典、罗马共和国近 500 年的太平盛世、中世纪欧洲诸城市共和国，以及西方现代性开端时期透出的缕缕微光中，都曾盛行着用“公民”形式来表述的国民话语，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里、卢梭等思想巨擘则代表了现代以前各自时代的典型。



不论上述思想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公民精神”都是贯穿于其思想的连贯主线，这体现在：公民精神是维系城邦或者共和国不至堕落的关键。如果公民的精神出了问题，共和国也将腐化变质。那么，“公民精神”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此，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可堪勾画：一是公民自身的优良品质，体现在审慎、冷峻、勇敢、有判断力等方面；二是同行公民之间的和谐、平等，公民之间亲如“兄弟”，凡公民皆能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轮流充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三是公民与国家关系上的公共精神和奉献精神，好公民皆能全心全意地、充满效率地通过其思想和行动来奉献于共同体的福祉，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使自身受益，而且使国家受益。同时，所有这些思想家都不认为公民精神是天生形成的，而是“公民教育”的结果。那就是，公民必须积极参与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通过公共生活来塑造其良好的品德，同时克制自己，不要把自己私人生活中的私心、奢侈、安逸等带入其中。

如果说上述思想家表明的是古典时代国民精神对于维系小型共和国所具有的重要性的话，那么，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则把西方国民精神带入了现代，通过其对美国的考察和思考，表明了国民精神对于维系一个大型民主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性。当法国尚在民主共和与贵族专制的泥淖中反复时，托克维尔获得机会到美国进行为期9 个月的考察，意在了解美国这一新兴国家的民主制度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他旋即发现，支撑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这是一个由逐步强化的个人观念、平等意识、结社意识、公共精神、权利观念、法治意识、自制能力等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公民社会。在描述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公共精神时，托克维尔不无羡慕地描述道：“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9 ］

然而，有点反讽的是，当历史转辗到20 世纪中后期之后，曾经被托克维尔热情讴歌的国民精神却表现出持续衰退的趋势。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长期研究表明，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性的加速、家庭婚姻方式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的影响等原因，美国公民的投票热情稳步下降了、结社热情持续下降了、社交密度日趋

衰退了、互助意识明显淡薄了，等等。近千万美国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时刻准备参与作为公民的活动，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保持着高昂的公民热情。如在 1980～1993 年的十多年间，打保龄球的人数尽管比过去增加了 10%，但保龄球的社团却减少了 40%，美国公民变得越来越喜欢“独自打保龄球”，［10］国民精神所依托的信任、互助、参与、结社等精神越来越成为明日黄花。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精神的变化给公共政治所造成的影响。随着公民越来越淡漠于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政治也越来越挣脱公民的掌控而落入精英和政客之手，曾经作为标志和象征的美国民主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西方国民精神的兴衰表明了其对于维系一个共和国的良序运转所具有的重要性。西方的历史经验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了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所得出的结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的制度架构和制度绩效终归取决于其国民精神的发展程度。无论制度等其他变量何等重要，国民建设终究是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国家保持其良善品质的基础。

国民建设的当前挑战

赘言中西方国民精神的目的在于以之为镜，映照当下。时下的历史尽管翻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沉重一页，在 30 多年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公民社会也已取得一些发展，但这并不意味我国的国民精神就已然成熟、国民建设业已完成。国民建设依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这不仅是因为当前社会生活中还表现出诸多与国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现象，而且还因为国民建设的背景已迥异于前，国民建设尚须与时俱进。

厉言物质富裕与国民精神之间背道而驰的文献已不在少数，而社会信任的缺失、政治参与的冷漠、核心价值的匮乏、公共精神的衰落等问题也的确在变得刺目。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改革的得失时曾经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1］不论政治思想可能有多少种意涵，经济建设与国民建设的失衡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时下，距离邓小平的讲话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国民精神非但未见改善，反有更加恶化之虞。日益趋紧的医患关系、渐行渐远的



核心价值、此起彼伏的暴力抗拆、形形色色的公权腐败，以及不断涌现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等，既表明了公共治理存在的问题，更反映了社会资本的流失、国民精神的恶化。在谈到当下中国的核心价值时，郑永年先生所言不谬。他指出，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还没有整合起来，因为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核心价值，因为还没有把它提炼出来。［12］

国民精神厥如的同时，国民建设的条件更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许多学者看来，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可以同步发展、并驾齐驱，似乎市场经济发展了，国民精神自然也就发展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作《国富论》以唤起市场经济的时候，还作《道德情操论》以提升国民的道德情操；约翰•洛克在作《政府论》以阐明自由主义之精义的时候，还作《论教育》以说明教育对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知道，缺乏道德约束的市场经济将会变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例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自私自利等。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成形，市场已成为调节社会生产和个体生活的基本力量。但是，从国民建设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可以催生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契约意识、平等意识等，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也可以摧毁对一个社会来说弥足珍贵的公益精神、集体精神、国家观念、亲情友情等。市场经济可以是国民精神的创造者，也可以是国民精神的终结者。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辅以相应的公民教育，它所催生的将不是现代公民，而是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者。在现代公民与自私个体之间，我们还不能信心满满地肯定不会走向后者。

日趋升级的社会流动性也对国民建设提出了挑战，这是时代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帕特南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表明，居所的稳定程度与公民精神的发育程度关系密切，稳定的居所可以促进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互助网络和参与意识等。［13］流动性，就像频繁移植植物一样，会对其根部网络造成损害。流动者需要花费时间才能在新的地方扎根。频繁的人口流动势必造成社会信任程度的减弱、社会联结纽带的松弛、社会凝聚程度的下降和公共参与的衰落等。投照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冲破了户籍制度的传统封锁而使人口流动变得汹涌如潮，市场的逐利性是驱动人口流动的持久动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流动是市场合

理配置劳动力的表现，因此是良性的；但从国民建设的角度来看，人口快速和大规模流动却使国民精神的培育变得更加艰难。在艰难应对年复一年的民工流、学生流以及由于节假日而催生的游客流时，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大规模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国民建设问题，更遑论形成明确的应对之策。

最后是多元化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给国民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市场经济打破了我国传统高度同质的农业社会结构，利益的分化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这给核心价值的凝聚和提炼增加了难度。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来临为国民精神的培育带来新的难题。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的生活方式将更加"个体化"、"私人化"和"消费主义化"。塑造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最有力力量莫过于电视和网络。时下，这两种媒介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成为个体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尽管两者都使共同体的范围得到了无限的延展，甚至覆盖整个世界。但是，这种延展是以共同体的精神作为代价的。电视和网络使共同体变得更加肤浅和空洞。电子科技使私人甚至是个性化的娱乐成为可能，这种情况造成电影院、篮球场、舞厅、咖啡室等公共娱乐空间的衰落，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从而变得越来越松散。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早在近 200 年前，托克维尔就曾警告："当人们之间不再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否则是无法使许多人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的。"［14 ］

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集中于一点：国民建设依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不仅国民精神的现状不容乐观，而且社会发展还给国民建设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发展思路已不再一味定位在"经济建设"上的话，如果"社会建设"已成为继经济建设之后国家建设的第二个重要环节的话，那么，"国民建设"就应当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未来第三步的"政治建设"——如果在我国的国家建设顺序上合理的话——就会成为奢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为它的到来准备好社会基础。

积极推进未竟的工程

梁启超曾言："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5］面对今日之中国，我们同样可以说，要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则国民建设工程不可不继续。但是，在阐明国民建设的方略之前，再次廓清国民和国民精神的语义，或许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所要推进的工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国民一词，常常歧义丛生，涵义多端。近代初期以前，国民常被看作是"外国人"、"外邦人"。如魏源之语："国民经营希利，算悉锱铢，亦多情普济之意。崇奉世主耶稣之教，舍身捐财，以招教师，颁文劝世。"［16］或者分别被看作"国"和"民"。如"而小钱禁令既严，制钱短少更甚，实于国民生计大有关系"［17］。或者被看作"普通百姓"，如康有为说道："其鼓荡国民，振厉维新，精神至大，岂止区区科举一事已哉？"［18］"中国不亡，国民不奴，惟皇上是恃。"［19］显然，所有这些涵义皆非现代性意义上的国民语义，也非本文所指的国民语义。现代性语境下的国民乃指民族国家的公民，他不仅具有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行使由这一资格所带来的权利和义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与这一资格相适合的精神，即本文所说的"国民精神"。举凡权利意识、自由意识、互助意识、国家意识、参与意识、自强意识等，皆属国民精神之道。国民只有具备了这些精神，人权才能得到尊重、权力才能得到公用、腐败才能得到避免、公序才能得到维护、公益才能得到促进。一句话，国家才能成为人民的国家。

要继续推进国民建设工程，固不能抛弃一切历史遗产而专事学习西方，这样势必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必须合璧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成就中国之国民精神。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时提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沥其本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20］这正是推进国民建设所必须采取的立场。更具体地说，国民建设必须立足本土，在淬沥自身历史的基础上，采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那么，中国国民建设工程有哪些重要要素可供淬沥和采补呢？准此，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道德"建设，它是个体成为合格国民的心理基础。道德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私德"和"公德"。无私德不能自立，无公德不能合群。"私德"体现在个人的私人关系上，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父母的孝敬、对朋友的忠诚、对家庭的和睦等；与之相对的"公德"则体现在



个体的公共关系上，即个体在团体或者共同体中所具有的公共精神上。中国历史重于“私德”建设而疏于“公德”培育。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指出，通过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个人“有可以为一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21 ］。言下之意，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他们严于修身、齐家，但缺乏国家思想，难于公共治理。私德可以成就合格的个体，但如果个体处理不好群体关系，共同体就无法建立，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一个社会虽有无数洁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但如果公德厥如，国家将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因此，对于国民建设来说，私德与公德实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互为一体的两面。只有严于律己，妥善处理自身与家庭、社区等周边群体的关系，同时又胸怀国家的人，才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国民。要做好国民，首先要做好个人。

第二，“权利与义务”建设，它是个体成为完整国民的表现。道德仅及于内心，现代社会除有其道德的一面外，还有其法理的一面，后者表现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上。如前所述，国民乃民族国家的公民，具有民族国家的正式成员资格，与这一资格联系在一起的乃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T.H.马歇尔（T.H. Marshall）把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概括为三个方面：以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民事权利”（civil rights）；以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以教育权利、医疗权利、最低生活保障权利等作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在马歇尔的基础上，其他许多学者再加入“参与权利”、“环境权利”等。公民义务大致可划分为：以纳税、遵守法律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支持性义务”；以关爱他人和自己、尊重他人权利、关爱儿童等作为表现形式的关怀性义务；以志愿服务、公益服务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服务性义务”；以服兵役、协助维护治安等作为表现形式的“保护性义务”等。［22 ］罗列权利和义务显然不是本文的目的，但享受或履行完整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却是国民成为合格国民的前提条件。否则，个体无论在道德上有多完美，他都不成为国民。西方政治具有悠久的公民身份传统，公民身份权利和义务则是构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采补西方经验，对于推进我国当下的国民建设大有裨益。



第三，“公民参与”建设，它是兑现国民建设的现实途径。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道德上的高尚程度，一个国家可以在文本或者宣传上宣称公民身份权利的完善程度，但道德高尚与否、权利真实与否、义务履行与否，却依赖于公民有序的公共参与和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的公共性程度也就越高，公权力也就越为人民所用。反之，公民越来越淡漠于政治，政治也就越脱离公民的掌控而落入少数官僚政客之手，国家之公器也就越成为腐败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积极的公民参与不仅可以提高共同体的公共性程度，而且可以提高公民个体的公共意识、权利意识、合作意识、参与意识等。公民参与是将道德、权利和义务兑现成现实的途径。就我国下一步的国民建设而言，激活已有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开辟新的公民参与途径、普及公民的公共参与知识、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技巧当是建设的重点。

第四，国民建设还有赖于“公民教育”的完善。公民不是天生的，而是依赖于后天的培养。在西方公民共和主义的理路中，学校教育、军事服役、公共服务等都被看作是公民教育的基本途径。就民族国家大部分是民主国家这一点而言，公民教育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更加重要。我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学校体系，在公民教育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公民教育的内容总体偏少，意识形态教化的内容总体偏多，这种做法弱化了公民教育的效果。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充分重视社会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志愿组织、互助组织等在教育和锻炼公民中的作用。

先贤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尽管我们已经告别了“民本”的时代而行进到了“民主”的时代，但其所表达的国家与社会意涵并没有过时。现代国家建设取决于体制的完善、制度的架构，但从根本上说，更取决于国民建设的完成程度。只有具备良好的国民基础，制度、体制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才有最终的保障。从这一点而言，清季开启的未竟的国民建设工程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必须在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指望政治不致出现大挫折，社会不致发生大动荡，国家能够达至富强、民主、文明之境。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0BZZ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号：11JJD840006）和中山大学“985 三期”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79.

［2］［3］［15］［20］［21］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3、2、7、8-9.

［4］章士钊.章太炎“客民篇”附论.苏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5］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216.

［6］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4 分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2002.

［7］［8］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333.

［9］托克维尔，董良果译.论美国的民主（上）.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113.

［10］［13］罗伯特·帕特南，刘波等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1、236.

［1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7.

［12］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206.

［14］托克维尔，董良果译.论美国的民主（下）.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695.

［16］魏源.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海国图志（第 16 卷），1843：1667.



［17］吕　孙.请改铸钱钱疏.皇清道咸同光奏议（第 38 卷），1854：2050.

［18］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戊戌变法（第 2 册），1898：21.

［19］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戊戌变法（第 3 册），1898：7.

［22］托马斯•雅诺斯基，柯雄译.公民与文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69.

（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 5 期。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7148）

【返回首页】





8-8 龙应台：灾难和教育的拔河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时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 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萨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我最常被香港大学生问到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化素养? 重点是“自己的”，以有别于从前殖民地所灌输的。台湾大学生最常问的是：面对全球化，我们要怎么做好竞争的准备？中国大陆的学生，问的是，现实和理想差距这么大，我们何以抉择？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大哉问：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面对全球化的新秩序，应该有些什么“基本配备”?

七零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着书——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 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11 山上的树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欲会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恶”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双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这你明白吗？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胶台灯。存在主义彷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

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萨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不就是萨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零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我也曾经多买了一本《新人生观》，万分郑重而且想必深情款款地送给当时的情人，书扉上的题字也依稀记得：

勿草草人生 应台一九七一

那人后来就草草不知去向。

不看尼采和萨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念又难记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萨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零年代的大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赞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①



从罗家伦到七零年代，中间是三十年。从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间又是三十年。在距离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七零年代的大学生能对今天大学生说什么呢？

六十年间，有两个关键的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动，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学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学生不再是"救亡图存"的众望所归。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结构里，大学生逐渐从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转化为井然有序的螺丝钉——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家国重任的屋顶依靠的不是几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摊给了无数的小钉细目。

小钉细目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样的结构里，教育的目的——从小学到大学，便很清晰：君权时代你必须培养贵族和菁英来领导国家，民主社会的有效运转，却得依靠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和义务。用教育来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献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国王 Pericles 的"阵亡将士国殇演讲"里所揭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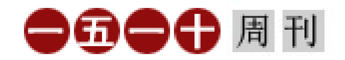
（和斯巴达比起来）我们的制度尊崇多数决，而非少数，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民主。在我们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阶级和贫穷都不能凌驾于能力的表现，有能力必被拔擢。我们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领域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我们极端宽容，却不流于混乱……我们培养品味但不失之奢华，我们学习知识但不流于无力……我们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对于公共事务又极具判断仲裁之能力。其他国家把公民的意见当作欲去之为快的"麻烦"，我们却认为公民参与是智慧决策的必要前提。

观念之前进，态度之自信，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里闪闪发光，比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统演讲还要气魄从容。

也是基于对公民教育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历史学家 H.G.Wells 在《历史大纲》（1920）里写了这一句话：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②





这句话不断地被政治领袖引用，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养有知识、有思辨力、有担当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执而起的血腥灾难。

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歧异纷争的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战争威胁的时代。眼前的歧异纷争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决定在我们——"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发现，三十年后，竟然又绕回到青年时期读到的萨特。然而这并不奇怪。萨特打过仗，当过德军的俘虏，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积极地从事地下抗敌工作。他太清楚战争与和平在一线之间，一念之间。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时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萨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罗家伦时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间，第二个关键而巨大的时代变异，是全球化。科技的发达不仅只改变了空间距离，更颠覆了六十年前的国家主权观念：

一个希腊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国或欧盟任何一国，在那里永久居留，他可以就业置产，可以投票选举，甚至可以自己参选。跟他谈传统的"爱国"，从哪里谈起？他要效忠哪一国？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八国和第九国的护照，最后他在第十国埋葬——请问，他要"爱"哪一个国家才叫"爱国"？

一个国家领袖，可以在政权倒塌之后，被国际法庭通缉，审判，他在位时的所有庄严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被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显然也不再那么绝对。



石油的价钱和货币的浮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可以让一个国家改变国策；一个地区的传染病可以迅速波及全球；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挑战国土疆界；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环境协定可以挑战国家主权，迫使个别政府妥协；一个国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响几万里外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生计；一个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胁到万里外另一个海域；百万的商人在外国注册，向外国缴税；千万的移民在流动迁徙，更换国籍；成亿的人在网上接收讯息，拆穿了自己国家的谎言；饥荒和疾病、战争和屠杀，以及饿死的孩子的无辜的眼睛，在罗家伦的时代，只有发生在自己的村子时才会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来到眼前，无处闪避；北极的冰山融解，全人类惶恐战栗。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纪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时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今天仍旧跟公民只谈如何爱自己的国，就犹如在一株大树的顶端全力筑巢，浑然不知大树的中节冒烟起火，大树的底端树干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钢锯锯着。

为何 CEO

怎么面对全球化的大浪来袭而不被淘汰，显然已经是很多人的焦虑来源了。针对这种焦虑，各形各色的因应全球化“指南”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题目叫“迈向卓越”或“菁英必读”的书籍和杂志永远被摆在机场书店进门最显目的展示台上，告诉你如何往上爬，变成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人 CEO。

我讶异的是，为什么全球化的挑战是以这种面貌出现呢？这里有两个明显问题：第一，何以你只看见强者却看不见弱者？跨国企业的发展固然促进全球经济和信息的快速流动，但是它同时蕴含着阴暗面——譬如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譬如强势经济带给弱势经济的文化倾斜，譬如儿童劳工的人权和大企业对落后地区的剥削等等。为何“指南”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强者”队伍，却不教你如何关注全球化的弱者，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为何不教你如何加入先觉者的行列，检验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批判全球化的恶质发展？



问题之二是，何以你只看见“竞争”却不看见“合作”？我们都知道，在一条逐渐下沉的豪华轮船上去抢它电影院里最好的位子没有意义，那么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里，缺乏宏观与深忧思维的竞争又有什么意义？全球化真正的议题是人类如何透过合作来保障地球环境的永续可能，透过协商来解决超越国界的贫穷、疾病、战争、人权等等问题，怎么到了我们的书店里，全球化的教战“指南”却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游戏规则里竞争得利，抢先挣钱？

全球公民意识

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很多先进国已经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个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网页，探讨的议题包括儿童权益、沙漠化、教育、和平促进、环境永续、脱离贫穷、艾滋病、水资源、人权等等。

点进“沙漠化”一栏，首先学的是关于“沙漠化”的常识：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不可耕的沙漠地。每年有六百万公顷可耕地因为沙漠化和土质恶化而成为不可耕的荒地。

2. 全球一百一十个国家受到沙漠化影响。两亿五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害于沙漠化，其中大部分是贫穷地区的人民。

3. 百分之二十七的中国国土已经沙漠化，并且每年有两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沙漠。约四亿人口居住在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带给中国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六十五亿美元。全球每年的经济损失大约四百二十亿美元。（联合国资料）

如果学生挑选内蒙古作为研究课题，教学手册建议老师将学生分组，以六个不同角色和立场来进行研究和辩论：蒙古牧民，中国官员，国际环保组织，志愿者，旅游业者，观光客。牧民对沙漠的历史情感、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他的经济需求，与政府官员从国家治理出发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国际环保组织所注重的环境层面，很可能和当地推动沙漠观光旅游的业者利益有直接冲突。观光客在享受越野车横扫沙漠的同时，又必须要有

什么样的常识和价值观，才不会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无知“共犯”？要解决内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扩大问题，这六个认知不同、立场矛盾的团体需要如何处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认识问题之后，是行动。网页接着告诉学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经有了什么具体作为，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又做了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

加拿大一个典型的教学网，议题之一是艾滋病的问题。第一步，是知识的建立。

知识，可以是数字和地名的背诵，也可以是复杂思辨的挑战。关于艾滋病的解说，内容竟是这样的：

自从一种抗艾滋的新药（ARV）问世之后，北美洲的艾滋病患者就得到某个程度的重生──他们虽得病，还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药价昂贵，一个人一年至少一万美金，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国家所负担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 ARV 的成分而发展出制药方法，在一九九七年开始生产，药价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将这低价的药外销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使穷人也能得到治疗。但是这个做法却违背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原生产药厂也强调，如果研发新药的知识产权不被维护，将来就不会有人愿意投资于新药的研发，对医药学的发展将是严重的打击。

学生们必须研究和辩论的是：穷人的治疗权和研发的知识产权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则，但是两者相冲时，怎么办？WTO 如何解决这样的两难？专家们对 WTO 这样的组织又有些什么样的批评？

国际乐施会的公民教育网页非常注重个人行为对于全球环境影响，学生认识到的数字是这样的：

假定你一天喝两杯咖啡，那么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仑的咖啡粉，它来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这些咖啡豆产自哥伦比亚，就意味着你一个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树。要栽培这十二株咖啡树，农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两杯咖啡等于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残渣流入并且污染哥伦比亚的河川。

原来全球化一点儿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个人在每日生活里所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有关。全球的未来，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责任。学生认识到，自己买来穿在脚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国的厂商剥削贫国横夺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个进口米特别便宜，可能是以本国农民的生计为代价；美化自己房间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厅里点选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种减少。

这样的课程，教学对象是小学生而非大学生，显然公民教育得从小学着手。先进国家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传统的“爱国教育”，“爱国”已不足以保存自己；从前所标榜的道德标准——不外乎忠诚礼义勇敢负责等等，也早已转换为对于地球和全球社区的关怀和行动。

大学生的基本配备

美国学生组织 Student Pugwash USA 所拟的大学生誓词是这样的：

我拒绝将我的所学用在对人类或其环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业追求务必以道德为优先考虑。此后个人生涯将压力备至，然而我签此誓言以表达我的认知：每一个个人承担起他的责任是迈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这样宣誓的大学生显然已经认识到，努力打拼变成一个公司总经理不是惟一的人生目标，如何让地球永续，让世界公平，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志业。

所以，对于“二十一世纪大学生的基本配备”这样的大哉问，我的不怎么“时髦”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远不过时。马丁路德金加以诠释：“教育的目的无他，就是教会一个人如何评估事证，如何判断虚实，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实和虚构。”社会愈开放，价值就愈多元，黑与白之间就愈多层次复杂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为全民课题。如果人民没有思辨的能力，徒有民主制度是没有用的。

第二，知识的建立。当我看见澳洲的小学生在学习内蒙古的沙漠化问题，德国的初中生在探讨南亚海啸所引发的贫富不均问题，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辩论欧盟和美国农业补助政策对加勒比海贫国的伤害，英国的社区学校在讨论全球暖化的因应对策，心中不免惊骇：中国的学生在学什么？

萧伯纳曾经极其讽刺地说，大学生在毕业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学校教过他的东西，才能真正面对社会。我也想说，在一个讯息封闭、心态内视的社会里，大学生必须自力救济，怀疑所有领导人和教育官员的论述和话语，建立自己的知识库，越过目光短浅的政府，越过低智能的媒体，自立与全球的知识网接轨，才能真正地面对二十一世纪。

第三，行动的能力。在整个华人世界里，素质最高、行动力最强的公民群体其实就在台湾。街头的动员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议、压力团体的运作、国会程序的翻案、媒体的调查揭弊、司法途径的争取、社运团体的串连等等，台湾人远远走在先锋，但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民社会正在兴起。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可以以极大的格局走在社会大众的前面，带头关心全球议题，开创社会风气。

第四，品格的培养。不知道是什么促使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

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会一个人深刻的思考，并且善于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这里，那么教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擅思辨但是毫无品格的那个人……我们必须深深记住：头脑聪明是不够的，头脑聪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他是在说希特勒吗？他是在说我们所目睹的那些强权者吗？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得到一流的专业训练，却不知同情心、正义感、廉耻为何物，如果他善于思辨却无法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分际，如果“道德”在他的价值观里没有一个基础地位，我们只不过在培养将来很有能力危害社会的人罢了。



核心价值的永恒

四零年代的大学生教七零年代的大学生：思想的锻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社会的承担。七零年代的大学生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思辨的能力，知识的建立，行动的参与，品格的培养。两相对照，我所说的，有哪一件，不是罗家伦和萨特说过的呢？

也就是说，六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变化何其之大，而核心价值的变化又何其之小。罗家伦和萨特所处的都是尸横遍野的血腥时代，他们思虑的是，要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进，物质发达，但是当年最关键的问题——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却因为科技发达和全球化而更为致命，更为迫切。

今天海峡两岸掌权的都是七零年代的大学生。掌权者愈是在乎权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狭。

如果说今天的大学生有什么优势的话，我想他们趁着年轻的理想特质，挟着全球化的新知磅礴，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开阔的全球视野来挑战七零年代的大学生，也挑战自己的成长。

（龙应台，台湾著名作家，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任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原文链接：http://culture.caixin.com/2007-07-11/100118881.html，http://culture.caixin.com/2007-06-01/100118256.html）

【返回首页】



【洞见专栏】

于灵歌：谁动了我的教育：港岛教育的政治文化论争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部门近日派发《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一事引发港岛民众争议。一些人认为，港岛国民教育应强调香港独特区域认同；也有人认为香港地区文化教育应纳入国家教育整体规划。事实上，香港教育因其特殊历史背景早已是研究者关注焦点。

针对港岛教育大背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李德博士分析，港英当局在香港长期推行的教育带有殖民化色彩，一方面淡化政治、国家和民族观念；一方面强调“香港居民”的身份意识，导致港人虽有民族意识，但国家身份认同模糊。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教授谢均才(Tse Kwan-choi)同样认定，前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对港人教育观念产生影响。港人在去殖民化和民主化过程中形成公民意识，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亦有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这一形成过程决定了教育体系的独特性。

李德博士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之争。在香港，“国民教育”指学校通过系统教学活动，增强学生对民族的认知，建立共同信念和价值，培养国家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公民教育”囊括的范围则更大，包括对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球的责任。或许，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差异正是港岛教育规划必须要考虑的。

谢均才提到，香港部分学者质疑官方只关注国民教育的立场。这些学者表示，强制主导对“爱国主义”的单一解读是否压制了民间多元的国家民族情感表达？对同质性的过分强调是否不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高？

按谢均才的说法，港岛公民教育是在多元教育体系、多样非政府组织和大量公民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形成独特的香港价值，不同于大陆的模式。例如，香港乐施会积极参与公民教



育，为教育工作者和年轻人提供知识、价值与行动三个方面的指导，提高对于贫穷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并呼吁改变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状况。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香港教育界希望学生适应具备国际化生存的基本能力，将更多的全球性话题如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多元文化、人权纳入公民教育，重视提高学生和民众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类问题。

谢均才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体现了地区化与民族化之间的“暗战”。在国家民族主义视角下，教育应提倡国家的整体和统一性；而站在经历了殖民历史的港岛视角下，“地区历史”、区域性价值认同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香港的教育应既体现民族国家文化，又注重地区价值传承。因此，在港岛教育提倡培养“中国人”意识，加强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教育同时，也应适应本地区文化，注重港岛特殊的基督教文化、人道主义、民主、反垄断主义等政治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Thomas Kwan-choi Tse (2007): Whose Citizenship Education? Hong Kong from a spatial and cultural politics perspective,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28:2,159-177

李德：从“浮城”到“生根”——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实施国民教育策略与创新机制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 12 月第 12 卷第 12 期

【返回首页】



【FMN 新闻】

中国多个城市反日游行

鉴于香港保钓人士等登上钓鱼岛，日本驻华大使馆 16 日通过电子邮件及主页等提醒在华日本人注意安全。日本大使馆要求在华日本人外出时留意广场等人群密集场所周边状况，与中国人接触时注意言行。

新闻：http://fmn.cc/RfJFna

8 月 18 日上街游行反日的西安市民约有数百名，人们打出标语和横幅，从西安城南的小寨、纬二街、长安路由南向北，往市中心钟楼方向游行。西安警方调动了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从微博上当地居民发布的照片来看，市民打出的标语比较激进，网友称由于游行终点的钟楼地区人数众多，迫使公交车也改道而行，现场的警力也无法有效维持秩序。

新闻：http://fmn.cc/OxG0i9

而 8 月 19 日中国多个城市发生反日游行，官媒也报道了杭州、广州、深圳等地的游行，人们都是拉着横幅边走边喊口号，队伍周围有公安人员维护秩序，深圳甚至出动了直升飞机，不过深圳、杭州等地也出现了打砸日料商店和日产汽车的现象，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另外成都游行的规模也比较大，春熙路、总府路都是抗议的人群和警察。

新闻：http://fmn.cc/NVx9rQ

http://fmn.cc/OxG2qd



谷开来案合肥宣判

8 月 20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薄谷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晓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二人当庭表示不上诉。英国使馆则表示一直明确表示不希望谷开来等人被判处死刑。

新闻：http://fmn.cc/NSvhhv

另外同此案相关并受审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等四人，当日法院也对他们作出一审判决，依法以徇私枉法罪分别判处郭维国有期徒刑十一年，李阳有期徒刑七年，王鹏飞、王智各有期徒刑五年。四人当庭表示不上诉。判决中称，他们明知薄谷开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使薄谷开来不受追诉，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引导死者亲属作出不解剖尸体的决定，均已构成徇私枉法罪。

新闻：http://fmn.cc/NSvhhv

《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谷家情况的消息称，当局周一宣判前就通知谷的家人，只要不提起上诉，20 天之内他们就可以见到**谷开来**。而且谷开来和张晓军将被送往北京服刑。

新闻：http://fmn.cc/OxHokJ

事件中另一人士尼尔·海伍德的家人则保持了沉默，受害者的母亲安·海伍德已经决定，不会回应媒体对此案的询问。有海伍德的朋友表示，其家人之所以保持沉默，首要的考虑似乎是海伍德的**中国**妻子王露露，还有他俩的两个孩子。

新闻：http://fmn.cc/OxGrJr

谷开来案宣判后，闯入美领馆并使得整个谋杀案曝光的**王立军**成为了人们的下一个关注点，这名曾经风光一时的“打黑”英雄，被法院的法官指出可能曾密谋杀害海伍德，以及牵涉众多大连、重庆的侵害人权的事件。有人士预计他可能会在本月因今年 2 月 6 日逃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而出庭受审。



新闻：http://fmn.cc/OxHicZ

8 月 20 日，**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夏泽良、祝仁超的市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新闻：http://fmn.cc/OxHqsV

摩托罗拉中国区大幅裁员

8 月 17 日上午，数十名**摩托罗拉北京**总部被裁员工挂起横幅，抗议裁员。条幅上书："反对暴力裁员，要求对等协商"、"用我们专利，杀我兄弟"。随后警方赶到现场，强行收走了条幅，抗议人士同警方发生了争执。据一名现场员工的微博称，"摩托罗拉员工反对谷歌报复性裁员，大部分中国员工被裁，这个裁员过程不公正，不透明。"

新闻：http://fmn.cc/RlZJ9d
http://fmn.cc/OxI8qj

此前，**摩托罗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在全球裁减至少约 4000 个工作岗位，其中，美国之外的地区占三分之二，还计划关闭或合并 90 家运营机构的三分之一。业内人士分析，按照摩托罗拉移动的重组计划，在华裁员很可能波及三方面：一是摩托罗拉在中国研发功能机的团队；二是摩托罗拉天津生产厂；三是摩托罗拉在杭州的机顶盒生产厂。

新闻：http://fmn.cc/OxI89K

摩托罗拉移动中国区经理 20 日表示，人力资源部已经于当天上午向被裁员工发了内部邮件，北京员工需在 21 日中午 12 点前签字。摩托罗拉移动将为员工提供 N+2 倍的月平均工资，公司补充住房公积金将一次性发放。针对员工未休完的法定年假，将按照员工小时工资数 300%的标准支付现金补偿等等。不过这些举措并没有缓解南京软件研发中心员工的不



满，20 日员工再次集体抗议裁员。

新闻：http://fmn.cc/OtH5HJ

http://fmn.cc/OxHBV

8 月 21 日晚间消息，**摩托罗拉**移动**南京**研发中心今日公布离职员工的补偿方案，大体内容与摩托罗拉移动北京公司的补偿方案一致。21 日摩托罗拉移动北京的裁员工作正式终止，最后约有数名员工未能与摩托罗拉方面签署离职协议。

新闻：http://fmn.cc/OxHI2Y

中共十八大临近

北京市公安局本周召开党的十八大安保监督保障指挥部启动仪式暨纪检监督系统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党的十八大安保监督保障工作进行了部署。另外，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近日部署自 8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进一步深化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淫秽色情出版物及信息专项行动，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新闻：http://fmn.cc/N1GArn

http://fmn.cc/N1GBvq

北京市城管等部门 20 日起启动“护心工程”，由城管执法部门牵头，联合综治、公安、交管等部门，对天安门核心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治理无照游商、黑车黑导游等违法行为。并且每个重点点位及责任区“3 名城管队员、1 名交警、2 名治安民警、6 名保安员”为一个联合执法小组。

新闻：http://fmn.cc/RfKY5z

据悉，**北京朝阳区**国庆及十八大期间的环境布置方案已经确定，将以展示党的光辉历程、欢度国庆佳节为主题，朝阳区将在 10 个景观节点布置大型立体花坛，并在重点路段布

设花柱。据介绍，该项工程预计投资 5000 万元。

新闻：http://fmn.cc/OtGA0u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原定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 8 月 26 日在北京宋庄举办，18 日下午在宋庄进行开幕式放映和酒会，参与者表示，当局对放映场地进行拉闸停电，现场还有大批便衣进行监视，导致观影被迫中止，之后又转移场地才得以看完影片。

新闻：http://fmn.cc/Ni5Bif

世界上最大的“尸体工厂”———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是将尸体“塑化”成人体标本的工厂，有关其尸体的来源近日在中国的网络上又成为了热点话题。有声明称**哈根斯**的尸体来自中国监狱，不过这份声明刊登在了其竞争对手的网站上，哈根斯在大连的生物塑化公司则已关闭半年。

新闻：http://fmn.cc/PF6lft

55 岁的辽宁首富周福仁耗时 2 年并投资 2.4 亿人民币在**朝鲜**建造矿厂，虽然有人提醒他朝鲜法制并不完备，政策风险较大，但并未阻止周福仁的脚步。然而投资却成为了噩梦，由于朝方单方撕毁合同并驱逐西洋集团，这些投资面临血本无归的惨痛后果。

新闻：http://fmn.cc/SpstZj

8 月 14 日有 13 名孩子来到**大理南国城**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20 岁，最小的仅 5 岁，孩子们手中都拿着一张要学费的标语。据悉他们的父母 6 年前曾在南国城项目打工，开发商拖欠 1000 多名农民工工资达 2000 多万元。

新闻：http://fmn.cc/RjmB9d



8·15 京东苏宁国美三大电商“约架”，引发网民和媒体的关注，不过这却是京东事先经过周密安排的公关战，主要是以**微博营销**的方式展开，进行这个策划的则是《创业家》前执行主编申音创办的微博营销机构 NTA。据悉营销重点是找一些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分析他们的微博喜好，策划适合他们转发的关于京东的内容。另外就是协调一些热门微博账号造势。

新闻：http://fmn.cc/RjhMN6

伦敦奥运会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媒体探访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部分冷门项目场馆，发现他们确实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一些场馆都已经杂草丛生并荒废。管理者认为是国人对这些项目的兴趣不高导致的上述现象。与此同时，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八成居民从不锻炼，患病人数 15 年增 20%。

新闻：http://fmn.cc/N7uQO4
http://fmn.cc/Ni7Odr

浙江省工商局 8 月 20 日一份关于食品生产日期和有效期的通报中，有一起**蒙牛**浙江义乌代理商销售临期奶,篡改 3000 箱牛奶的有效日期长达近半年的案件。而且这些牛奶还以 45 元/箱的蒙牛正品价格销往浦江、义乌等地。目前该案已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新闻：http://fmn.cc/NEDlpN

国家统计局 8 月 17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1 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 13.47 亿人，比 2002 年增加 6000 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0.53%。而 0-14 岁的儿童已由 22.4%下降到 16.5%，少子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4 岁以下孩子所占比重不到 10%。

新闻：http://fmn.cc/Ni72NF

哈尔滨 8 天内连发 7 起地陷事故，引发市民恐慌。当地媒体批评指事故主要原因在于“路面的豆腐渣工程、维修的不及时、安全监管的不到位、路基被挖空、管理者不作为”。另外 22 日**北京**西大望路也再次发生路面塌陷，抢修部门称是因持续降雨造成。





新闻：http://fmn.cc/PCpRY8

http://fmn.cc/Ni5t26

一名叫“焦作退伍兵”的天涯版主因发贴讲述**焦作** 8 月 7 日晚一起车祸家属求助的消息，并在 13 日到焦作市政府围观并图文客观记录了死者家属讨说法的情况，不仅被警方约谈警告，更在 15 日被警方秘密抓获并以涉嫌“敲诈勒索政府” 的罪名刑事拘留。这一事件引发了论坛网友的不满。

新闻：http://fmn.cc/OTaqON

据已公开的媒体报道统计，自**广州市城管委**成立 3 年以来，该系统“落马”或受处分的 27 名官员上至市城管委副主任，下至街道城管执法队员。而且全市 12 区市中，越秀、天河、海珠、荔湾、黄埔、白云、花都、番禺 8 个区城管系统皆有犯案，涉案金额将近千万元人民币。

新闻：http://fmn.cc/Ni5eEe

奥运会 110 米栏比赛中，官方介绍称，**央视**解说员杨健赛前就拿到了刘翔伤情严重的消息，并汇报给了解说组组长沙桐。沙桐汇报给了副总编辑李挺，再将领导指示面对面传达给了杨健。最终杨健做了四套解说预案。23 日一家媒体则以《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观众在傻等见证奇迹的时刻》为题报道了此事。

新闻：http://fmn.cc/RfIWCt

http://fmn.cc/RfJx6Z

【返回首页】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黄雯怡、姚梧雨童

校订：方宜农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田悠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